

# 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

劉祥光\*\*

## 摘要

隨著科舉考試的施行及與印刷術的推波助瀾，宋代書籍的數量與日俱增。其中「時文」的刊行蘊含多重社會意義：官方出版品象徵模範的宣揚；書商有時違法刊刻，透露這類考試用書的商機甚大。而學子競相購買，則顯示其對於求取仕途的渴望及為學態度。至南宋中後期，書坊轉而請士人或士大夫選文，利用這些人的知名度，推廣其銷路。不僅如此，南宋後期，個人的時文冊子也出現了。考生利用時文冊以為投贊之用，冀求通過考試。本文試圖經由分析「時文」編寫、刊印的過程，認識科舉制度與考試書籍出產的關聯，同時明瞭時文在宋代社會的重要性。

關鍵詞：宋代 科舉 時文 書坊 印刷術

---

100.02.15 收稿，100.04.21 通過刊登。

\* 筆者特別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建議與修正意見，減低本文不少錯誤，也使其中的論點更具體與完備。本文初稿發表於“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int Culture in China”（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2005），會中得 Michael Fuller、賈晉珠（Lucille Chia）與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三教授，以及諸位學者的建議，受益良多。二稿曾發表於「第十三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2010年5月21-22日），惠承評論人黃繁光教授的指正，甚有助於本文之修訂。姚政志先生代為蒐集資料，李佳若小姐與友人 RR 通讀本文。在此併致謝忱。文中錯誤皆由筆者負責。本文曾得國科會贊助（NSC 89-2411-H-004-016），亦表感謝。謹以此文獻給先師傅示心宗懋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一、前言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考試大國，考試文化也特別發達。現今海峽兩岸的學生準備入學考試，手邊多少都有些參考書籍，以為參閱、練習之用。而出版業為考試而發行的各類參考書籍琳瑯滿目，成為獲利甚鉅的一個文類。這種情況早已存在於中國社會長達近十個世紀，並非今日獨有。此外，現今的入學考試中，國文科裡必然有作文題。雖然作文在總分中的比重不算高，但不少學生仍為作文而努力，購買模範作文書籍，或上補習班強化實力。但是二十世紀以前的考試，除了類別差異外，幾乎都是作文題。如果說現今的學生會為作文而購買相關書籍，甚或上補習班，接受課外指導，過去的考生也會這麼做，而且購買「模範作文」以為參考模倣的情形，也可遠溯回近十個世紀前因施行科舉考試而起的種種情況。

略有中國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科舉考試自隋代開始，在唐代成為錄取寒門之士的重要管道——雖然未盡如朝廷之意，卻在宋代大盛，造成新士大夫階層的興起。在宋代大盛的科舉考試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極大：「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耳熟能詳的俗諺就是宋代科舉考試的產物。本文即在於探索宋代科舉取士之後，當時的模範作文——時文——對社會的影響。

## 二、文獻回顧

在學術界，「時文」並不是一個新議題。但由於文獻浩瀚，如果要全面討論考試文化中和時文有關的作品，勢須另撰專文，本節只能以專著為主，兼論及少數與本文有關的論文，做選擇性的文獻回顧。第一本論及時文與科舉文化的近代學術論著可能是陳東原在1936年出的《中國教育史》，在這本至今仍可謂體大思精的論著裡的第廿一章〈八股文之型成與明代社會〉中，作者除了討論八股文之由來，並提及自採行八股取士後，少年從事舉業者往往不讀經史，只讀坊刻時文的現象。此外，書中特有一節專述「應試之生活與思想」，讓讀者能很快瞭解那個時代考試生活之艱苦。<sup>1</sup>

商衍鎔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是本研究科舉考試的重要參考書籍。作者

---

1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重印），頁327-352。

為前清進士，以過來人的經驗現身說法，對於清代的考試制度（包括八股文的寫作）有詳盡的討論，並附上多幀圖片與照片。該書內容豐富，決非回憶錄性質。其中的第八章〈科場案件與軼聞〉談及清代（兼及前代）各種考場弊案、冤案、弊端與圍繞於考試的各種奇聞軼事。該書新版另附作者的〈科舉考試的回憶〉，寫出當年的考試生活經驗，有別於筆記小說中片斷的描述。<sup>2</sup>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1963出版的《科舉：中國の試験地獄》也是一本討論清代科舉的論著。書中進一步釐清科舉考試的內容，自入學的縣試和府試，至院試、科試、歲試、省試、會試、殿試等，並論及武科舉與制科。整體而言，這本小冊子偏向介紹清代科舉制度的導論性著述。此書後被謝康倫（Conrad Schirokauer）英譯。<sup>3</sup>

本文討論的重點是宋代的考試文化，以下將集中討論宋代科舉的研究著作。賈志揚（John W. Chaffee）的《宋代棘闈：考試社會史》（中譯本書名《宋代科舉》）中的第七章〈通過棘闈：科舉文化〉談到宋代採行科舉後，在社會上產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考試用語的增加，和考試有關的禮儀的普及，對舉人的補助，科舉建築的興修，各種和科舉有關（含宗教性質）的故事大量出現等。<sup>4</sup>這章在本書談宋代的官學、科舉考試與公平性問題各章中，雖然顯得調性相當不同，但也為這個新領域打開了一個出口。

日本學者高津孝的《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是本論文集，收錄的論文超過書名所示。其中〈宋初行卷考〉、〈北宋文學之發展與太學體〉與〈宋元評點考〉等篇圍繞在科舉考試所引起的各種變化。<sup>5</sup>

祝尚書的《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也是本論文集，收錄了二十二篇作者在

---

2 本文引商衍鎏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為據，此書係以原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上海：三聯書店，1958）為底本，加入作者後來撰寫的文章而成。

3 宮崎市定，《科舉：中國の試験地獄》（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英譯本見 Ichisada Miyazaki,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trans. Conrad Schirokauer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6; repri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 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new edi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中譯本：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1995）。筆者以為該書的中譯標題未能盡顯此書的內容，行文中略加更動。

5 高津孝著，潘世聖等譯，《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006年所寫有關宋代科舉考試的論文。<sup>6</sup>在本書中，有將近一半的篇幅是討論宋代的考試制度，如發解、省試、類省試、殿試、諸科、制科、詞科、糊名、詩賦經義之爭、罷詩賦等。然而該書有相當多（一半以上）的篇幅討論制度以外的文化變遷。例如探究兩宋的「太學體」，討論北宋科舉改制如何影響南宋的文學走向，追溯南宋評點古文的起源，考察科舉制度下的士人心態等。其中分析理學與科舉的關係，宋代科舉用書，宋初進士行卷與文學的關係，以及讀書階層的「君子事業」與「舉子事業」等都是新穎且深入的研究。其後祝尚書以本書為基礎，擴增篇幅，調整內部結構與論點，寫成《宋代科舉與文學》，該書特別之處首在於大量增加對於科舉時文的討論，由原先的一章，增為個別分析詩賦、策論與經義等三章。其次，作者在本書增加一章探討科舉與學風、文風的關係。第三，文中將科舉對文學的影響擴張為二章，分別討論科舉如何促進文學的發展，以及科舉與文學發展的悖反。<sup>7</sup>整體而言，本書新增的部分不僅拓寬，也加深了我們對宋代的科舉與科舉文化的認識。

何忠禮的《科舉與宋代社會》收入十一篇與科舉有關的論文，其中兩篇與科舉文化較有關係。在〈論科舉制度與宋學的勃興〉中，作者認為「宋學」之興起與科舉重儒學經義考試有很大關係。這個觀點很特別。<sup>8</sup>林岩的《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一書除了討論北宋的科舉制度演變外，也論及一些制度所引起的改變。該書第三章〈新政時代（1071-1085）科舉改革與學風、文風之轉變〉中，作者認為仁宗朝（1022-1063）中後期士人間流行「性」與「命」的話題，有相當廣泛的討論，因此到了神宗朝（1068-1085）的科舉考試中便流行談論「性命之學」。而當時儒學的「性命之學」在深度上尚不如佛教與道教，因此讀書人轉向佛老者不少。儒學受此刺激，才發展出宋代的「理學」。此外，該書附錄〈宋代科舉考試與印刷術關係考論〉則是談論印刷術與科舉參考書的發展。<sup>9</sup>

魏希德（Hilde de Weerd）《內容的競爭：協商南宋科舉考試標準》是本從宋代思想史的角度探討考試標準／文化變遷之專著。<sup>10</sup>作者想解答的問題

6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7 見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47-320，520-574。

8 見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頁67-114。篇名是〈科舉制度與宋代文化〉與〈論科舉制度與宋學的勃興〉。

9 見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18-141，258-285。

10 Hilde 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是：「職業、政治與思想群體如何形塑準備考試的課業標準與評定考試文字的標準？」相對地：「考試標準如何形塑相關政治與思想群體的計劃？」她認為在南宋的考試場域中可分成永嘉學派（如陳傅良、葉適、呂祖謙與陳亮等人），以及以程學為基礎而由朱熹完成的道學兩個派別，並仔細分析現存十二世紀中期科舉考試中論與策的史料及語言，顯示考生須能在論中表現出其歷史知識與如賦般的策文。在第二部分裡，作者指出永嘉學者如陳傅良和葉適係當時甚受歡迎的教師，其文字也一再地被書坊集結刊刻。永嘉學派關心的是時事，要求朝廷要改革制度、減輕賦稅並減少支出，因此要學生研讀歷史，特別是《永嘉先生八面鋒》和呂祖謙的《歷代制度詳說》，雖然永嘉教師的科舉著作中整合了二程的道德哲學之說，但強調減少開支和由地方政府做決策才是解決政府各種問題的首要之務。道德倫理只排在第二順位。道學派的朱熹強烈反對永嘉派的這種看法。再者，他雖然是位名師，卻反對學生為了考試而讀書。他認為德行應被提升成為考試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解決政府問題之道應從道德著手，因此他要學生研讀哲學經典如《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以探尋聖人的心靈。朱熹的看法在其生前因黨爭而未能實現，死後其弟子發揮師說，朱熹的主張才逐漸被整併入考試內容。到了十三世紀中期，理宗下詔二程與朱熹入祠孔廟，道學成為正統，在科舉考試內容上才取得全面的影響力。

除了探討宋代科舉文化的著作外，另有幾本研究考試文化的專著也應該在此一提。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明清科舉考試文化史》是第一本跳脫出純以制度論述科舉之作，而將科舉考試放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讀書人生活的交會處分析，因此該書涉及的層面甚廣，內容極為豐富。<sup>11</sup>本文無意介紹全書內容，有興趣的課者可參閱李弘祺的評論。<sup>12</sup>須特別指出的是，書中有相當長的一章討論考生的焦慮，金榜題名夢以及考試的生活，這點和賈志揚前書中論科舉文化一章類似。其次，書中也有一章探討八股文的源起、寫作及其影響。作者在本章中還談及墨卷、房稿、時文選本的刊行與流通。從明代中期開始，思想界因王陽明學說的崛起而有很大的變化，他也從思想的角度深入分析八股文的寫作如何受思想變化的影響，由早期為程朱學說籠罩，轉變為充斥著王陽明的學說，甚至文中還瀟灑禪學氣味。這種現象受到明末清初一些人的嚴厲批評，八股文除了應試之外，幾乎一無是處。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的時文

---

Press, 2007)。

11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2 見李弘祺，〈中國科舉制度的歷史意義及解釋：從艾耳曼（Benjamin Elman）對明清考試制度的研究談起〉，《台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3），頁237-267。

選家如艾南英（1583-1646）、呂留良（1629-1683）與戴名世（1653-1713）對於中進士的八股文也有相當的批評，認為那些得進士的文字並非佳作。這麼一來，文衡的角色就在民間而不是在朝廷。但是方苞（1668-1749）編《欽定四書文》卻讓八股文守住了這個文類在科舉考試與文學史上的地位。艾爾曼認為清末改革之士大力抨擊八股文無用，事實上有意忽略這個文類在讀書人生活中的意義與重要性。

周啟榮的《明後葉的出版、文化與權力》一書討論明代萬曆（1573-1619）中期以降坊刻書籍對於科舉文化變遷的影響。<sup>13</sup>作者指出，出版的商業化加速知識的商品化與文學作品，使得經濟場域與政治場域的關係重新配置。更多出版贊助商提供那些已放棄科舉考試的考生與文士必要的經濟資助。其次，文學批評的日益精細可證明閱讀大眾的多元化。文學上的傑出成就不再侷限於詩與散文兩類，更多的文類所需的文學技巧大有別於傳統評論詩與散文的訓練。而專業化已穩固地在文學作品場域中建立起來。其三，坊刻數量大為膨脹的結果（印刷品的知名度、剽竊、造假、盜印以及當時的「版權」概念），使得有關製作可信度與非法挪用可信度的作法也隨之增加。作者也認為坊刻也形塑考生準備科舉考試的作法。在這方面，科舉用書的「側文本（paratext）」，如各種註解《四書》的書籍，影響尤其重大。晚明的書坊大量出版與科舉考試有關的側文本，暗地裡顛覆了官方意識型態，創造出新的論述空間，挑戰朝廷對於儒家經典的詮釋權威。明廷採行朱熹的《四書集註》的權威性被當時其他的註解書籍（如張自烈的《四書大全辯》）嚴重地質疑。不僅如此，萬曆中後期書籍市場上出現了時文刊本。起初是官刻時文的刊行，但隨著商業印刷的興盛，坊刻本不但在數量上大大地超過官刻，也因時文選家／選手對於其所選的時文的評論，而挑戰官刻本的權威。這麼一來便又開啟了一個論述空間，使得這個領域內的作家與評論家的權威凌駕考官之上。其後一些文社選出的作家通過科舉考試的比例甚高，反映出考官受考生結社的壓力影響。也就是說，明末的考生透過坊刻以及結社，正面挑戰考官。簡而言之，明後葉勃興的商業出版文化重重地衝擊明代中央政府維護正統的努力。

沈俊平的《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也是本從印刷文化／出版史的角度研究明代的科舉參考用書的流通。<sup>14</sup>本書從明代科舉

13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此處的介紹側重於本書的第三、四與五章。

14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用書的起源與發展開始，並探討書籍的讀者，坊刻用書的編纂者的變化。作者仔細論述科舉用書的種類與版式，而且也分析其宣傳手法與各種流通管道。他同時指出，明代中葉以後科舉用書的發達的確刺激當時的出版業，有助於知識的流佈，一些有名的士大夫即藉此登科。但利之所在，弊亦隨之。科舉參考書的盛行也使晚明的文風與學風敗壞，其中以八股文選本的影響最大。這是朝廷與有意振興國勢的士大夫始料未及之事。整體而言，作者以綿密的一二手史料，為讀者描繪出明代中期以後考試與印刷文化的圖像，使我們對那個時代士人的讀書生活有深刻的認識。

上述舉出艾爾曼、周啟榮與沈俊平的研究，是因為他們對彼此的研究有些對話：他們或運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場域（the cultural field），或借重簡內特（Gerard Genette）的側文本（paratext）架構，以不同的角度分析，讓我們對過去的考試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顯示出研究上一波接著一波，迭有高潮的情形。艾爾曼採用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指出科舉考試成功地攫取了企圖心強烈的男性與其家庭，讓他們把縉紳的地位看成是考試中第。而對於許多家庭／族而言，他們在社會上的優勢（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可以被輕易地轉化成為學術上的優勢（科舉表現），即布爾迪厄所謂的「文化資產（the cultural capital）」。因此，科舉制度造成了社會與文化的「再生產（reproduction）」。不過，作者也修正布爾迪厄與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對教育與再生產之間緊密的關係。<sup>15</sup>

周啟榮的研究也採用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他同意艾爾曼的看法，認為科舉考試是再生產明清社會、政治與文化秩序的主要制度。但是他也指出，這樣的看法掩蓋了經濟場域（the economic field）內作法的變化（各類書籍的出版），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的程序。他也認為艾爾曼說「考試大宅院」（examination compounds，指考試的讀物、規定等）乃「文化的監獄（a “cultural prison”）」，是誇大了科舉考試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的功能。因為這種觀點過度強調科舉考試在馴化菁英上的決定性力量，把菁英

---

15 艾爾曼第一次運用「再生產」概念是在其一篇論文之中，見 Benjamin Elman,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 (1991): 7-28. 亦見艾爾曼，〈中華帝國後期的科舉制度〉，收入氏著，《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39-157。再生產的概念來自於 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Sage, 1990). 中譯本：P.布爾迪厄、J-C帕斯隆，邢克超譯，《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當成帝國系統中，一群溫馴的唯命是從之士。不僅如此，這種研究取徑有兩大問題：其一，這種取徑誇大了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其二，它也誇大了科舉考試的教化力量。由於這樣的觀點和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權力的詮釋很相近，因而忽視了文士有好幾種方式可以抵抗，甚或顛覆官方的意識形態。上述對於周啟榮研究的簡介即說明他和艾爾曼二人間，解讀考試制度之差異。

魏希德同意周啟榮在其研究中援引布爾迪厄（以及簡奈特的「側文本」）的觀點，並且她也採行「場域」的概念來分析南宋科舉考試標準的變化。不同的是，魏希德大體接受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說法，認為參加科舉等同於把考生視為國家的臣民。換言之，參加科舉隱含對國家合法性的承認。自宋至清，這樣的觀點皆一體適用。她還進一步指出，科舉的場域與朝廷及官僚政治有重疊之處；派系鬥爭流溢至如何準備考試之處，而且派系的計劃也會形塑考試的寫作內容。從這個角度而言，魏希德對於周啟榮所說——坊刻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擴展在考試的場域中，實具有顛覆的潛在力量——雖然頗表同意，但她要研究的是，士大夫、朝廷以及形塑如何準備考試的思想與政治關係之間的協調過程。此外，魏希德也同意周啟榮利用簡奈特的「側文本」概念，分析一些評註的書籍如何形成閱讀大眾，而且通過這些側文本，以理解政治權力如何運作。然而她指出，周氏在分析側文本如何與政治實作連上關係方面，不如他分析在文藝場域內，側文本如何產生知名度與力量來得成功。再者，她對艾爾曼運用布爾迪厄的「再生產」概念也不完全同意。她指出，科舉課程在十二、十三世紀的改變無法用文化再生產的模式恰如其分地解釋。士人與百姓的差別，以及士人群體間的差別，是文化再生產與文化創新共同造成的結果。

上述的文獻回顧中顯示，對於中國近世考試文化的研究在近二十年來有很大的進展。而近十年的成果尤有日趨精細的現象。不過對於時文如何影響考試文化的問題，仍留下空白區塊。例如魏希德以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南宋科舉考試內容的變化，但時文在社會文化上的影響非其主要關注焦點，因此著墨偏少。此外，艾爾曼、周啟榮與沈俊平對明清考試文化或當時時文的刊行之研究確實精采，但他們所描寫的現象並不是明清時代才發生。其實對於宋代時文的研究並非沒有，朱瑞熙的〈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應是第一篇研究宋元時文的作品。他在其中將宋元時代的時文分為北宋、南宋前期和中期、南宋後期以及元代四個階段的發展，討論考試形式與格律的變化，並比較宋代科舉中的經義考試十段文與明清時代八股文的異同。<sup>16</sup>羅時進與劉鵬的〈唐宋時文考論〉

16 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收入氏著，《嚶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1-22。



是另一篇研究時文的作品。作者在文中考證「時文」一詞在唐代（及唐以前）的涵義與在宋以後的差異，同時指出時文北宋才較具明清二代時文的意義，但要至南宋時期才走向明清的八股文形態。<sup>17</sup>這兩篇重要的研究讓我們清楚地瞭解唐宋時文的意涵與其內部的演變。然而前述的空白依然未被填滿，因此本文將以時文在宋代社會文化上的義意為分析重心，希冀彌補這方面的空缺。

### 三、刊本遽增下的時文

印刷術在宋代普及後，書籍刊印的數量大增，知識的流佈較前代更快更廣。即使是當時人也察覺到這種現象，李燾（1115-1184，1148進士）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真宗於景德二年（1005）五月參觀國子監書庫，「問祭酒邢昺〔932-1010〕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sup>18</sup>照邢昺所說，十一世紀初印板的成長近乎宋初三十倍之多，雖非精確數字，但反映書籍增加之快。

距邢昺約一個世代的蘇軾（1036-1101，1057進士）也說他聽過「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sup>19</sup>蘇軾所言導致書籍大增的重要原因是書坊加入刊印之列。葉夢得（1077-1184）的《石林燕語》裡記載，唐之前未有板刻（事實上唐已有印板），「人以藏書為貴」。五代宋初雖有印本，但數量極有限。自淳化（990-994）以後，書籍刊刻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sup>20</sup>葉夢得生活於北宋後期至南宋中期，「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的情形至少反映他那個年代的現象。此外，元儒吳澄（1249-1333）回顧宋代出版史，也指出：「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天下，而中秘〔宮中藏書〕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嘗有

17 羅時進、劉鶚，〈唐宋時文考論〉，《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4期，頁63-71。筆者感謝一位審查人告知本文的重要性。

1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標點本），卷60，真宗景德二年，頁1333。

19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1，〈李氏山房藏書記〉，頁359。

20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8，頁116。

與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光，書彌多而彌易。學者生於今之時，何其幸也。」<sup>21</sup>所有上述的描繪都指向一個事實：宋朝不僅是個書籍大增的時代，而且刊本價格較手抄本便宜許多。<sup>22</sup>

在這個板刻湧現的時代，出現了所謂的「巾箱本」。大約和葉夢得同個時代的張守（1084-1145，1102進士）說：

學者苟媮，而聖人之經僅出於鬻書之肆，刊印射利，乃與傳記小說、巫醫卜祝、下里淫邪之詞並壽於塵閉。大抵捐數千錢，則巾箱《五經》可以立辦，故士子於經亦褻慢不虔，苟取名第，則委棄籍躡，粘牖覆瓿，炷燈拭案，不復顧惜。蓋得之也易，則用之也輕，而傳之也不久。<sup>23</sup>

張守的形容令人驚異，巾箱《五經》竟然如此低價。宋人戴埴說：「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1208-1224〕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煨小板，近又盛行。第為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sup>24</sup>看來巾箱本被用來考試作弊。至於其品質，據清末民初的葉德輝（1864-1927，1892進士）說，他所經眼的巾箱本，「字纖如髮」，刻工之精細不難想見。<sup>25</sup>近人傅增湘（1872-1950，1898進士）的藏書中就有宋巾箱本的經書，係建陽刊本。傳說該刻本筆畫「精麗方峭」。他另藏有宋巾箱本的《四朝名臣言行錄》，刊印品質「佳勝」。<sup>26</sup>

與前代相較，宋代書籍大增，和科舉考試頗有關係，幫助考生的各色工具書也應運而生。<sup>27</sup>其中新科進士的考試作品是受矚目的參考文獻。試舉一例說

21 元·吳澄，《吳文正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4，〈贈鬻書人楊良甫序〉，頁19a。引文中楷體字係筆者所標。

22 見翁同文，〈印刷術對於書籍成本的影響〉，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5），頁489。

23 宋·張守，《毘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0，〈秦楚材易書序〉，頁6b。

24 原載戴埴，《鼠璞》，轉引自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景印民國9年刻本），卷2，〈巾箱本之始〉，頁82。

25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2，〈巾箱本之始〉，頁82；卷9，〈無錫秦刻九經之精善〉，頁479。

26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宋刊巾箱本八經書後〉，頁1-2；〈宋刊巾箱本四朝名臣言行錄〉，頁180-181。

27 有關科舉考試與刊本增加的關係，此處只舉二例說明。寶元元年（1038）有大臣論：「近日學者編經史文句，別為解題，民間雕印，多已行用。〔朝廷〕考試之時，不

明：北宋中期，石延年（994-1041）過世後，歐陽修（1007-1072，1030進士）撰寫墓表，由蘇舜欽（1008-1048，1034進士）謄寫用以刻碑。居間聯繫的是詩僧秘演。歐陽修撰成，蘇舜欽書畢後，原稿卻被賣出去。事後歐陽修卻驚訝地在開封定力院看到自己的文章，問寺僧何以有此文，回說是用五百文買到。歐陽回頭怒問秘演何以其文只賣五百文。秘演笑答：「公豈不記作省元時，庸人競摹新賦，叫於通衢，復更召呼云：『兩文來買歐陽省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陽修聽這話後，也笑了出來。<sup>28</sup>

對本文而言，這則趣事的重點在於，歐陽修在天聖八年（1030）得省試第一名，放榜後，他的考試作品立刻被刊印出來，沿街叫賣。中進士的考試文字放榜後被刊印販賣的作法，早在宋初真宗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時即出現，可見這類科舉高中的文字受考生重視。<sup>29</sup>購買的人顯然認為這類作品有助將來的科舉考試。再舉一例。陳瓘（1074-1122）之甥李偕於省試前夢及拜訪其友人，然彼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專心讀書，無視李偕來訪。李心中頗慍，把書搶過來，「視之，即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sup>30</sup>由此可見，當時考生關心科舉高中的文字之一斑。而自其中可知，此類文書亦稱「時文」或「程文」。<sup>31</sup>

---

須一一迴避。其經典、子書之內，有《國語》、《荀子》、《文仲子》、《儒學所宗》、《六典通貫》，先朝以來嘗于此出題，只是國庠未有印本。」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景印），〈選舉三之十九〉，頁4257。那些是幫助士人備考的工具書。其二，葉德輝，《書林清話》，卷6，〈宋監本書許人自印並定價出售〉，頁291-295。其中他引宋代史料，說明：「宋時國子監板，例許士人納紙墨錢自印。凡官刻書，亦有定價出售。」換言之，只要士人有需求，可向國子監納錢購取。

28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頁59。

29 見宋·葉夢得，《巖下放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佚文·來歲狀元賦〉，頁354。

30 宋·何蘧，《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李偕省試夢應〉，頁6。

31 省試之文會被刊印，還有一個南宋的例子。《四朝聞見集》記載閩人林執善得開禧元年（1205）省試第一，「試〈聖人備道全美論〉，至今舉子誦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鑑》行於世」。從《林省元文衡事鑑》的書名看來，該時文冊是書坊刊刻流通。見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丙集·田雞〉，頁98。文中說林執善與危和同年中進士，經查昌彼德、王德毅、程元敏等所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5增訂版），頁643。危和係開禧元年進士。

乍看之下，宋代「時文」一詞的內容，頗有與「古文」相對之意。「時」有當時、臨時之意。這個說法不能說錯誤，卻忽略了歷史演變。據學者研究，「時文」一詞在唐代以前指的是當代文明，也作禮樂制度解釋。另一方面，約自魏晉南北朝時代，時文也逐漸意指「與時推移」的文體。而且在《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筆下的「時文」明顯地指當時反映主流的文學作品，也並不排除「四字密而不足，六字格而非緩」的駢體文學。但當時並無科舉，「時文」自不具有考試文章的意涵。屆至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其中賦著重駢對與文辭，嚴格規定音律和押韻，因此被稱為「律賦」。但當時仍不以「時文」名之。一直要到北宋以科舉取士，「時文」才指考試文字。<sup>32</sup>因此宋代的時文多是指科舉考試文字。例如歐陽修自況昔時：「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又說：「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sup>33</sup>他稱讚亡友蘇舜欽「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1023-1031），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舜欽字〕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詞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sup>34</sup>歐陽修在兩段文字裡都把時文和古文相對。而且提到時文，頗有不得已而作的無奈之意。陳舜俞（卒於1072，1046進士）說自己「牽拘時文，習溺進取」。<sup>35</sup>但似乎也有人喜歡讀時文，如葛閱（1003-1072，1027進士）：「雅好評論時文，每得一篇一詠，摘其佳句，成誦于口。兩為南宮點檢試官，凡經賞識者數十。」<sup>36</sup>這類人士可能較少。

前述的例子中顯示，「程文」是時文的另一用詞。此因寫科舉文字須符合規定的格式，即程式，因而有此稱謂，以下舉數例說明。歐陽修於天聖七年（1029）得太學解元後，寫〈謝國學解元啓〉，自謙「濫吹之曲，誤中程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sup>37</sup>李復（1079進士）也說自己「迫於生計，學今日程文，

32 見羅時進、劉鶚，〈唐宋時文考論〉，頁63-67。

33 宋·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47，〈與荆南樂秀才書〉，頁660。

34 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卷41，〈蘇氏文集序〉，頁614。

35 宋·陳舜俞，《都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進治說序〉，頁1b。

36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57，〈光祿卿葛公墓誌銘〉，頁875。

37 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卷95，〈謝國學解元啓〉，頁1429。

一試而忝預名第」。<sup>38</sup>劉安節（1068-1116，1110進士）也自謙「比年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sup>39</sup>此外，嘉定五年（1212）太醫局丞何大任與局內教官「相與搜括近年合格程文，拔穎取尤」者，編成《太醫局諸科程文格》，讓有志進入該局的考生有準備方向。<sup>40</sup>這些例子說明時文與程文所指相同。

此處必須指出的是，「時文」雖成為一種文類，其內容在宋代卻有演變過程。依據朱瑞熙的研究，時文在宋初是四六駢體文。至仁宗景祐（1034-1038）初年後，太學生考試為求勝出，文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瑣為膽」，號為「太學體」。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力矯此弊。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改變考試內容，廢詩賦，改以經義取士，時文內容也就跟著變化。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朝廷又改設詩賦進士與經義進士兩科。高宗朝之後，文體仍有些變化。然因這類變化與本文重點關係不大，在此只稍做說明如上。<sup>41</sup>

## 四、時文的流通

### （一）官刻與私刻時文

前一節已略提宋代中進士的時文會被刊印販售，本節再引幾個例子深入說明。李復出知耀州時，曾被當地的鄉貢進士問如何寫好時文，他回答：

某辱問科舉程文之體，今之印行為有司考之在高等者，其文乃程文之體也。雖然，此豈有定體？先須講求義理的當，中心渙然，乃可作文。義理若非，雖洪筆麗藻，亦非矣。又，為文須去塵言，用事實，貴整齊，意分明，此其大畧也。諸君於此想盡善矣。<sup>42</sup>

文中指出，在省試或殿試中被置前列的應試文字會被刊刻流通，且被視為模範，

38 宋·李復，《滴水集》，卷4，〈答彭元發書〉，頁5a-b。

39 宋·劉安節，《劉左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謝免省〉，頁17b。

40 見宋·何大任，《太醫局諸科程文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原序〉，頁2b-3a。

41 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頁1-22。另見竊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臺北：知書房，1996），頁85-164。

42 李復，《滴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又答耀州諸進士書〉，頁7a-b。

但我們無法確定李復所說的這些時文究竟是官刻或私刻。儘管如此，他強調，時文要寫得好，必須先明「義理」。換言之，義理是本，時文是末。其他士大夫也有類似的看法。

但是官方對時文刊本的評價多屬負面。徽宗崇寧二年（1103）九月有大臣奏：

竊謂使士知經，咸欲如元豐〔1078-1085〕之盛，莫若取諸經時文印板一切焚毀。今後除府、監發解、省試并太學補試、公私試第一名經義，方許印行；其余悉不得賈售。<sup>43</sup>

為什麼要如「元豐之盛」？由於這段歷史和此處的論述關係不大，暫且不表。<sup>44</sup>但文中有若干處當解釋者。「府、監發解」指的是地方考試，即解試；補試是太學の入學考試；公試係太學內部的考試，歲一舉，用以補內舍生；私試每月一考，用以查核學生讀書情況。<sup>45</sup>此處提到的刊本有可能是官刻，也可能是書坊所刻，各地情形未必相同。如果把這條史料倒過來解讀，不難想像當日一位還在準備解試的考生手上可能買到多少種類的時文：其一，他可以從書肆買到省試放榜後，各科（諸經）錄取的考試文字。其二，他也能買到太學的考試文字：包括入學考試，每年一次的公試，每月一次的私試，只要是合格的文字或許都可購得。其三，每三年一次解試的得解文字也會受到注意。考試既分三場，因此他拿到的會是三場文字。當然，多數考生不可能購得上述全部的時文。但如果放眼全國，當日時文流通量就非常可觀。<sup>46</sup>

43 徐松輯，《宋會要·選舉四之三》，頁4278。

44 這其中涉及北宋後期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宰相是蔡京（1047-1126，1070進士），而從熙寧、元豐以來激烈的新舊黨爭延續至徽宗朝。蔡京上台後，恢復王安石的政策，考試以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字說》、《周官新義》等為主，壓抑舊黨的主張，除去他們在科舉上的影響力。略見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221-228。近年有學者重新評價徽宗朝的歷史，對蔡京的看法也有所改變，見John W.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77.

45 見王建秋，《宋代太學與太學生》（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頁48-78。

46 另外，南宋魏了翁（1178-1237，1199進士）曾提到他早年在邛州蒲江縣學參與補試的試卷被當年縣令之子保留。由此可推知通過補試的卷子也會被刊刻。見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

就官方而言，得解以及中進士的文章未必篇篇佳作，自然有必要規範時文的出版，因此只有各次考試第一名的文字才能流通。但實際情況顯示，這樣的規定幾如具文。大觀二年（1108）七月，提舉淮南西路學事蘇軾奏：

諸子百家之學，非無所長，但以不純先王之道，故禁止也。今之學者程文，短晷之下，未容無誤，而鬻書之人急於錐刀之利，高立標目，鏤板誇新，傳之四方。往往晚近小生以為時之所尚，爭售編誦，以備文場剽竊之用，不復深究義理之歸，忌本尚華，去道逾遠。欲乞今後一取聖裁；儻有可傳為學者式，願降旨付國子監並諸路學事司，鏤板頒行，餘悉斷絕禁棄，不得擅自賣買收藏。<sup>47</sup>

這條奏疏的背景是，此時仍由蔡京當政，排斥舊黨之學。儘管有這個政治背景，仍可顯示書坊為了商業利益，以聳動的書名，誇示發行最新版的科舉考試文字，一時之間洛陽紙貴。時隔一個多世紀，時文的流通量越來越大，俞文豹（約生活於1250）自言：「嘗見時文冊子，遇太學公私試，一題即印三二十篇，讀至五十篇，加至十數，便已困倦。」<sup>48</sup>這種情形有可能在北宋後期就已如此。朝廷一再申禁令，或許收效一時，長遠看來，效果可疑。時文氾濫產生的副作用是，考生「不復深究義理之歸」，這和前面李復所說要先讀通經書的原則正好相反。

禁止不合當道的時文在南宋初年依然可見。《宋會要》裡記載紹興十七年（1147）六月

左修職郎趙公傳言：「近年以來，諸路書坊將曲學邪說『不中程』之文擅自印行，以瞽聾學者，其為害大矣。望委逐路運司差官討論，將見在板本不繫六經子史之中，而又是非頗繆於聖人者日下除毀。」從之。<sup>49</sup>

南宋初年，秦檜（1090-1155，1115進士）當政，延續徽宗時代蔡京等人推崇王（安石）之說，打壓程（頤）之學。秦檜之所以如此，和趙鼎（1085-1147，1106進士）有關。二程之學在南宋為人所知，是因為趙鼎的提倡。但是趙鼎與秦檜在與金人和議一事上意見相左。趙鼎後被逐出朝廷。秦檜與金議和後，心知肚明當時反對者不少，此事一定會被記錄，流傳後世。因此他以「右文抑史」的

65，〈跋四十年前補試卷〉，頁6b。

47 徐松輯，《宋會要·刑法二之四七》，頁6505。

48 宋·俞文豹，《吹劍錄》（臺北：世界書局，1980），《吹劍四錄》，頁90。

49 徐松輯，《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五一》，頁6557。

手段，清除時人的記載。在政治上就是打擊異己。為了徹底清除趙鼎的影響力，除了在政治上迫害趙鼎和李光（1078-1159，1106進士），在科舉上則是打壓程學。例如紹興十四年（1144）十月，右正言何若指出，趙鼎倡「伊川〔程頤〕之學」，引進理學人物高閔，是以如《正蒙書》、《聖傳十論》等書「務為好奇立異、流入乖僻之域」的書籍十分風行，以致「曲學遂行」。因此建議顯黜此等「乖僻之論」。十一月，御史中丞楊愿指出反議和的人士「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說，以為就利避害之計」，因此建議禁伊川之學。直至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仍有官員表示，建州邵武鄉鎮民間仍有「以非僻之書妄行開印，乞委州縣檢察止絕」。<sup>50</sup>上述引《宋會要》文中「不中程」之文指的就是和程學有關的時文。朝廷除毀諸路書坊那類書籍的板本，反映出該類書籍對於當道不利，自然必欲除之而後快。

雖然官方禁止時文流通的起因不一，成效亦難估計，但想除去時文影響力的企圖仍不時浮現。紹熙元年（1190）四月光宗即位後不久，太學博士彭龜年（1142-1206，1169進士）上奏〈乞寢罷版行時文疏〉。他指出：

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近日虛浮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今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帙，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為朝廷取士，不過如此。……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於公私試文字精加攷校，以義理明正者為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瞻者為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既明，趣向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sup>51</sup>

彭龜年在學術上親朱熹與張栻，慶元黨禁（1195-1200）時，他被打入「偽學」一黨。但其遠因之一是，在此之前朝廷中「理學集團」士大夫與「官僚集團」

50 有關這段歷史，略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新文豐，1980景印光緒庚子〔1900〕年廣雅書局本），卷152，頁4804-4805；卷169，頁5392-5393；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景印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卷32，〈選舉五〉，頁300。亦見黃寬重，〈秦檜與文字獄〉，收入其《宋史叢論》（臺北：新文豐，1993），頁41-66，尤其是頁51。此外，根據陸九淵之五兄陸九齡（1132-1180）的傳記上所載，南宋初葉，秦檜主政，當時「場屋無道程氏學者」。見黃宗義、全祖望，《宋元學案》，收入《黃宗義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卷57，〈梭山復齋學案〉，頁257。

51 宋·彭龜年，《止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乞寢罷版行時文疏〉，頁3b，6a，7a。



已交鋒數回。孝宗（1163-1189在位）後期，理學集團如周必大（1126-1204，1151進士）、朱熹等人認為皇帝身邊的一些「近習」（即「官僚集團」）對朝政有不良影響，設法把他們逐出朝廷，理學人士暫時居上風。然而「近習」也伺機班師回朝，襲擊「理學集團」。<sup>52</sup>彭龜年在紹熙二年（1192）上書光宗（1190-1200在位），注意「小人道長」已成事實。「小人」無疑指的是光宗旁的近習。這封上疏自然刺激「小人（近習）」黨。<sup>53</sup>這段歷史已為學者指出。但是前此又有這份奏疏點燃戰火：其中不免暗指朱學才是正學，其他的是曲學。官僚集團得知此疏，必然含怒在心。朝廷選刊時文竟然成了政爭來源，多數學者忽略了這篇疏文在政爭中具有宣戰書的地位。但此處的重點之一是，彭龜年提到研讀時文成了學習的核心，而且要考進士的人都會去買時文。重點之二是，彭龜年所說的並非新現象，至少北宋中期已可見，他只是再強調一次而已。

宋代由書坊編輯、流通的時文冊子除了上述所提之外，再舉數例。《文淵閣四庫全書》收入《十先生輿論註》十五卷，《後集》十五卷與《續論》十卷（原十五卷，闕五卷）。據《四庫提要》上說：「《十先生輿論註》四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亦無刊書年月，驗其板式，乃宋時建陽麻沙坊本也。」<sup>54</sup>《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七二》中載有慶元二年（1196）因「禁偽學」而下令劈毀的書板中，有《七先生輿論》，因此《十先生輿論註》可能是擴增《七先生輿論》的內容，並再加上評註。疑此書是在黨禁解除後的刊本。

再如十三世紀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及《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其注解云：

《擢犀》者，元祐〔1086-1093〕、宣〔和，1119-1125〕、政〔和，1111-1117〕以及建〔炎，1127-1130〕、紹〔興，1131-1162〕初年時文也；《擢象》則紹興末。大抵科舉場屋之文，每降愈下，後生亦不復識前輩之舊作，姑存之以觀世變。<sup>55</sup>

這段文字有幾個重點和本文有關：第一、《擢犀策》應是紹興年間出刊的時文，

52 見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頁120-134。

53 見謝康倫著，何冠環譯，〈論偽學之禁〉，收入海格爾（John Winthrop Haeger）等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168。

54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187，〈總集類二〉，頁1704。

55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5，〈總集類〉，頁458。

反映出南宋初期當時士人對時文的需求。第二、《擢犀策》顯然是卷帙浩繁的合集，紹興年間要編輯這樣卷帙浩繁的套書，背後一定有許多時文印本當基礎可供挑選。其中不少是北宋後期所刊行。第三，《擢犀策》所收錄的是北宋後期至南宋初期的時文，而這段時間朝廷推崇王學。這也反映南宋秦檜當政時期，延續北宋後期蔡京當政時，尊王學、抑程學與反元祐舊黨的政治背景。從這點看來，編輯時文的人熟悉政治情勢，很可能是士人。第四、從引文中最後一句看來（「大抵科舉場屋之文，每降愈下，後生亦不復識前輩之舊作，姑存之以觀世變」），到了十三世紀，多數考生已不知《擢犀策》了。這反映出時文的刊刻會隨時代與政局而被淘汰。第五，《擢象策》是紹興末年的刊本，而且亦屬卷帙浩繁者，價錢當不低，反映出書坊預測這類刊本有市場。

## （二）士人編輯時文

另一類的時文刊本則是由士人編輯。曾於乾道（1165-1173）中出任樞密院編修的衛博（生卒年不詳）在未第前編過時文冊《弈錦編》，<sup>56</sup>《弈錦編》序道出編書的來龍去脈，全文引出如下：

余自幼雖習進士舉，然性不喜讀時文。今年下第東歸，過其同舍生，生曰：「子亦知夫子之所以不售者乎？『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此太學之諺言。不爾，雖至老不可得也。」余蓋聞退之〔韓愈〕言，嘗自讀其所試，不啻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蓋自退之已不免矣。吁，可歎哉！今余以家貧親老，求舉進士，亦必至於得而已。苟必志於得，而求之以不可必之道，是豈人之情也哉？於是盡取世之所謂時文書，其善者而伏讀之。凡時文之學，類以善漁獵，戕賊竄竊，摹擬取青媲白，肥肉厚皮為上，真柳子厚所謂以文錦覆陷穽者，然而世之觀者眩焉。余不幸知之，而自投於陷穽之內，乃名其編曰《弈錦》，非以名斯文也，將以識其所學，而亦其心之一日不忘乎堙穽徹錦，載鞭策，鳴和鸞，以安行乎康衢大道，庶幾得遂此志云爾。以其甲為賦，乙為論，丙為策，而序見於此焉。<sup>57</sup>

文中提到「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應該是流行於太學中的諺語，反映出當時一般考生極端重視時文的心態。此書可能是衛博編應書坊之求而為之。據《宋

56 衛博簡歷，見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4047。

57 宋·衛博，《定庵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弈錦編序〉，頁10a-b。

會要輯稿》記載，慶元四年（1198）福建麻沙書坊發現《太學總新文體》的刊行，其中收錄前一年太學春試都魁郭明卿的〈問定國是〉、〈問京西屯田〉與〈聖孝風化〉等文。但是國子監查明後，發現郭明卿既不曾中選，也未曾寫過上述三篇文章。顯然這本集子是書坊偽造。不惟如是，此時文集還涉及當時的「偽學之禁」。<sup>58</sup>這個例子說明太學程文的確有市場，書坊為圖利，不惜造假。因此書坊可能看重衛博的太學生身份，或許他也有點名聲，所以找他編時文集。

衛博選編時文之舉並非特例。大陸學者祝尚書在其《宋代科舉與文學》中的〈宋代的科舉用書〉一章舉出許多這方面的例子，其中絕大部分是由士人所編。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科舉用書之一斑。<sup>59</sup>然而為了彰顯宋代這個文類出現的重要性，此處須提出其中有幾本參考用書略為討論。

現存《文淵閣四庫全書·總集類》中收入魏天應編，林子長註的《論學繩尺》，「是編輯當時場屋應試之論，冠以〈論訣〉一卷，所錄之文分為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由福建建陽書坊刊印。據考證，魏天應是鄉貢進士（通過解試的舉人），也是謝枋得（1226-1289，1256進士）的學生；而林子長是臨安京學教諭，皆屬閩人。<sup>60</sup>相較起衛博選編的時文刊本，這本集子除了同樣是由尚未中第的士人編輯，還有低階官員的評註。不僅如此，我們也可推知，當時這類有編者掛名，也有序文的時文選本應該不少。只不過衛博後來中進士，文集中留下了這篇序文，而魏天應與林子長的選本未留下任何文字。此外，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十卷，不知編者，從書名看來，或許是《策學繩尺》的姐妹編本。<sup>61</sup>這三本時文印本反映出一個事實：明代中後葉士人評選時文的考試文化，早在南宋中後期已出現。<sup>62</sup>

58 徐松輯，《宋會要·刑法》，卷2之129。有關偽學之禁，略見Conrad Schirokauer, "Neo-Confucianism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ieh," in John Winthrop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75), 163-198. 中譯本：謝康倫著，何冠環譯，〈論偽學之禁〉，收入海格爾等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頁159-186。

59 見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頁406-425。

60 清·永瑤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集類二》，卷187，頁1702。亦見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8，〈論學繩尺〉，頁366-372。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60-61.

61 見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卷8，〈策學繩尺〉，頁372-373。

62 筆者曾指出，自明代中葉以後時文選本大盛，出現不少有名的選家。而那些選家成名時，未必皆進士及第。明代時文刊本氾濫的情況大約也自此時開始。見劉祥光，〈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2期（1996），頁

衛博的序文還道出了重要的訊息。他一開始就說「余自幼雖習進士舉，然性不喜讀時文」。這是說自幼要考進士的人必須要習時文，雖然自己並不喜歡這個科目，而最快入手方式就是習時文。換言之，宋人一旦走上考進士的路，其生活即免不了讀、寫時文，而且從年輕時就如此。他們可以不喜歡時文，但幾乎沒有閃避的可能——閃躲等同放棄前途。因此像衛博這樣不喜歡時文，最後卻不得不承認太學中的諺語「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是有道理的人應該為數甚夥。

事實上，閱讀時文是如此重要，它成為士人的（引用布爾迪厄的概念）「習性（habitus）」，也是存在於他們之間的「俗見（doxa）」——「不習時文，齒豁目昏」不就是太學生的「習性」或「俗見」？<sup>63</sup>我們甚至可說，閱讀時文成了士人的一個標記，無論他們有無崇高的理想，畢竟出仕是（或曾是）他們的重要目標。換言之，在宋代，只要問一個人是否正在讀（或讀過）時文，以及讀（過）誰的時文，我們就可以判定此人是否為士人——包括那些讀了之後，不喜歡而放棄者。這樣的判定標準也可用於宋以下的各朝。時文對考試文化的影響，在此畢露無遺。

生活於南宋中期的袁采（約1140-1195）撰有《袁氏世範》一書。該書常被看成是中低階層士大夫延續家庭（族）命脈的指導性書籍。他在其中便說：「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資之美，能習進士業者，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奉。」<sup>64</sup>那些開門教授的士人所教的內容應該包含時文的寫作，而衛博編時文冊子的序讓我們明瞭，當時有許多落第舉人有可能也編輯這類時文刊本，或以維生，或以教學之用。<sup>65</sup>

54-62。亦見商衍鑒著，商志馥校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257-258

63 有關「習性」與「俗見」，略見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2-95, 164-165. 中譯本：布爾迪厄，宋偉航譯，《實作理論綱要》（臺北：麥田出版，2009），頁148-195，326-327。亦見Karl Maton, "Habitus," 與Cécile Deer, "Doxa," 二文俱收入Michael Grenfell, ed. *Pierre Bourdieu* (Durham, UK.: Acumen, 2008), 49-66, 119-130.

64 宋·袁采，《袁氏世範》，卷2，〈子弟當習儒業〉，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1985），冊30，頁154。

65 例如呂祖謙的老師林之奇（1112-1176，1151進士）在考取進士前即為舉業教師，編《觀瀾文集》以為教材。略見呂宜軒，《呂祖謙的舉業教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23-24。亦參見梁庚堯，〈南宋教學行業興盛的背景〉，收入田餘慶編，《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

時文刊本的外觀似乎有某種刊印形式，當時人可以輕易認出。前述李偕的故事中，他在省試前夢到其友人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一看之下，竟然是自己省試第一名的程文。<sup>66</sup>這是第一次我們得知時文本子的外觀是黃色的。南宋的葉適（1150-1223，1178進士）也提到「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者，謂之『黃策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sup>67</sup>劉克莊（1187-1269）的詩句「書坊黃冊誘兒童，朝取封侯夕拜公」，亦是一例。<sup>68</sup>劉黻（1217-1276，1262進士）也謂「區區黃冊子，所事惟奪魁」。<sup>69</sup>而林景熙（1271太學上舍釋褐）寫信給鄭樸翁（1240-1302），稱「公程文在『黃子冊』中，膾炙海內，至今誦之」。<sup>70</sup>時文本子至少到了南宋被稱為「黃冊子」。元人歐陽玄（1283-1357）在一篇序文中談到其父是南宋太學生，專研《春秋》，亦通他經。1275年蒙古人攻陷臨安，科舉停廢。其父不忍見前代時文散逸，遂請朋友留心蒐集，結果「穉載充牣」。他閒暇時便翻閱那些時文，選取其中特出者，另成一選本。當時歐陽玄兄弟年方幼，其父告彼：「黃冊子會有行世時，兒曹毋忽也。」其父死後七年，元朝恢復科舉，他當年就中第。<sup>71</sup>可見即使到了元代，時文仍稱黃冊子。而且由歐陽玄的描述中也可知黃冊子的價格算低，否則難以蒐得如此之多。<sup>72</sup>

出版社，1997），頁559-570。

66 何遠，《春渚紀聞》，卷1，〈李偕省試夢應〉，頁6。

67 宋·葉適，《水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3，〈科舉〉，頁13b。

68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13，〈題永嘉黃仲炎文卷〉，頁5b。

69 宋·劉黻，《蒙川遺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和紫陽先生感興詩二十首〉，頁14a。

70 宋·林景熙，《霽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頁18a。可能是手民之誤，將「黃冊子」誤植為「黃子冊」。

71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14，〈彭功遠先世手澤〉，頁2b-3a。其中文字有脫漏者。見明·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9，〈圭齋題彭氏程文〉，頁95。

72 根據張秀民的研究，南宋福建陽縣麻沙刊本的用紙，因考慮減低成本，以竹子製成，紙呈深黃色。目前無法確定有多少黃冊子是在麻沙刊印，但時文本子的紙質多數欠佳。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91。亦見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 五、時文揚己的用途

宋代的時文到了北宋後期又多出一種用處，這要從宋初考試制度的改變說起。唐代的科舉文化裡，考生會對禮部以外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官員「投行卷」，希望能得到後者的揄揚，並獲推薦。<sup>73</sup>根據學者的研究，宋初士人也有投行卷的作法，也是希望收到行卷的人能推薦他們，為之延譽。但是隨著科舉考試在太宗淳化三年（992）實行殿試糊名法，真宗景德四年（1007）實行省試糊名法與仁宗明道二年（1033）確立解試糊名法後，行卷就失其功能，不再為士人採用。<sup>74</sup>然而，前節提到的葛閱在天聖五年（1027）中進士前，曾以平日文字投贄給蘇頌的父親蘇紳（1019進士）。<sup>75</sup>此外，在歐陽修的文集裡至少看到三則他答謝士子投贄的書啟，其中一篇注明寫於寶元二年（1039）。<sup>76</sup>為什麼投贄之風在實行糊名制後仍未根絕？下節將試圖回答這問題。

### （一）投贄之風還魂

科舉考試採彌封方式後，後來的投行卷者想要像他們前輩那般較有保障地通過考試，的確希望渺茫。但是考生依然故我，仍希望將來的考官能熟悉其文字風格。舉例而言，在宋代扛起古文運動大纛的是歐陽修。他有鑑於當時文體的流弊，倡為古文。嘉祐年間（1056-1063）太學生員劉幾數度在太學內部考試中奪第一，但「驟為怪嶮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修卻甚為厭惡這種文體。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省試，用怪嶮之語者，皆遭刷落。有一試卷被他認為是劉幾所作，判語謂「紕謬」，張貼示眾。榜出，果為劉幾之文。數年之後，歐陽修再度主持省試，劉幾又預試，歐陽修再申除惡務盡之意，刷落疑似劉幾的卷子。放榜之後，卻是別人所寫，被歐陽修擢為第一的卷子反出自劉幾之手。<sup>77</sup>這個故事反映出兩件事實。第一，太學中得第一名的試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29. 亦見潘吉星，《中國造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258-259。

73 略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259-296。

74 見竊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頁59-66；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頁1-24；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頁340-362。

75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57，〈光祿卿葛公墓誌銘〉，頁872。

76 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卷95，〈謝人投贄啟〉，〈謝石秀才啟〉，〈謝李秀才贄見啟〉，頁1437-1438，1445。

77 宋·沈括著，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9，〈人事〉，頁344。

文的確為人仿倣。第二，這類文字具有個人風格，即使是在匿名考試裡也容易被辨識。因此儘管科舉考試已採糊名法和謄錄法，但個人寫作風格卻可以被認出，那些士子從而冀望達到投贄的目的。<sup>78</sup>不僅如此，根據程千帆的研究，唐代投行卷的對象須鄭重選擇——士子覺得可能有助於他們登科的官員才會被考慮。<sup>79</sup>宋代投行卷的士人自然熟悉其中道理。這是為什麼上節提到歐陽修所以收到士人投贄行卷的主因：歐陽修曾兩度知貢舉，且可說是當時文壇盟主。

就在這樣的想法下，投行卷的作法在北宋後期以另一種方式死灰復燃。《宋會要輯稿》中有下列一段訊息：

〔大觀二年，1108〕十一月五日，宣德郎、前利州州學教授何浩言：「朝廷一新學校，革去科舉之弊，而復興鄉舉里選之制，法令至具矣。每年一試，類差有出身人以充考試官，而應舉之士未嘗經歷學校，考以素行，徒用一日空言定為去取，故諸州士人亦意有出身官必差充考試，而取其空言也。往往編集平昔所集經義、論策之類，猥以投贄文字為名，交相請託於有出身官之門，以僥倖一得。且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許印賣。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豈可容私自編集，以為請託之資乎？欲乞諸路州縣應有出身之人，將來合差充考試官者，不得收接見任或他州縣士人投贄所業經義、論策文字，庶絕前日科舉僥倖之風，而上稱朝廷所以委任考求行實之意。」從之，仍先次施行。<sup>80</sup>

利州路在轄區約今日四川北部與部分陝西西南方。由於北宋在開封的藏書受金、元二朝戰亂的影響，所存著作極有限，因此無法確知利州路的北宋刻書的情形。根據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張秀民所列〈南宋刻書地域表〉，利州路也在其中。<sup>81</sup>從上面所引的史料看來，利州路的北宋刻書情形大既也屬不差。

78 另一個例子是陸九淵（1139-1192，1172進士）。《宋史》記載呂祖謙（1137-1181，1163進士）「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目前無法確定陸九淵曾否投贄，但呂祖謙能一眼看出陸九淵的考試文字，即因前此對九淵的行文風格有印象。見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標點本），卷434，〈儒林四·呂祖謙〉，頁12837。

79 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收入氏著，《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冊8，頁24-27。

80 徐松輯，《宋會要·選舉四之六》，頁4279。引文中劃底線者係筆者所加。

81 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頁93-94。

除此之外，上段史料仍須稍做解釋。文中「出身」一詞有兩層含意：一指官員；另一指進士及第資格。在宋代的就指進士及第的官員。而在上段文字中所說的有出身人指的是當地進士及第的官員，可能也包括在鄉待闕的官員。朝廷命他們充試官，想必著眼於這類人士有考試經驗，瞭解如何評等士人的考試文字。此外，這段史料的背景是蔡京行三舍法，於崇寧元年（1102）訂州學升貢制，地方學校士人每三年貢入太學，經太學三舍法考察合格者任官。兩年後，「令州縣學用三舍法陞太學，罷科舉」。三舍法在地方學校實行的方法是學生由外舍、內舍、上舍逐級考核，內容以「行」（操行）、「藝」（學業）為主，考核的人是學校教官（州學教授），而上舍生要貢入太學也須經考核。考核的方式不一而足，包括「八行取士」、保薦、與升補試。<sup>82</sup>其中升補試由地方「有出身」官員主持，通過之後才可到京裡參與太學補試，再貢入太學。這種制度的理想不可謂不高，然士人為求更上層樓，卻可以操弄此制度，投行卷正是操弄的結果。

到了宣和三年（1121），因三舍法弊多，朝廷遂「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之」。<sup>83</sup>這個由地方到中央的三舍法，其實是蔡京要貫徹王安石人才由學校出的理想。但由於始料未及的各式弊端，實行起來只有二十年左右。回到事件發生的場景來看，上段史料有這麼幾句：「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許印賣。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豈可容私自編集，以為請託之資乎？」那些投贄文字由私人刊刻後，投給相關官員。也就是說，投贄文字之風在三舍法之前即已行之——雖然無法得知風行的程度。但可確定的是，三舍法實行後，投贄之風大盛。此時糊名法已實施半個多世紀，似乎堵住了過去投行卷而產生的弊病，但此時士人的出路只有升貢一途，可想而知，大家莫不使出渾身解數。試卷雖已彌封，但如能讓試官對自己的文字有印象，使他在評定試文時較能認出自己的文字，投贄不失為一種可行且較有希望的法子。這就是投贄之風盛行的重要原因。如果前述的利州路因印刷術普及而出現投贄之風，那麼有相同（甚至更佳）印刷術條件的地區如開封、杭州、紹興府、成都、平江府、福州、建寧、婺州、衡州等地，應該也會出現類似的投行卷作法。因此利州路當地出現的投贄之風不會是北宋後期的單一事件。

屈至南宋，淳熙元年（1174）陳益在業師陳善（約1169進士）《捫蝨新話》序文中說，陳善文行甚著，由太學登進士。而「今鬻書肆中有論十篇，乃先生

82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七》，卷46，頁432-433。亦見王建秋，《宋代太學與太學生》，頁35-44，49-57。

83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七》，卷46，頁433。



為諸生時所為贄見祭酒周公敦義〔生卒年不詳〕者。或託以王龜齡侍郎〔王十朋，1112-1171，1149進士〕，非也。若其場屋所試，不肯蹈襲時文，畦徑獨出，硬語橫空排募，故往往不為有司所喜。閒遇明眼，則置高等。士之在太學者能言之。<sup>84</sup>陳善把平日所作呈太學祭酒過目，除了讓周敦義瞭解自己近日的情形外，也有讓後者熟悉自己的寫作風格。其後書坊把作者張冠李戴成王十朋，也無非看中十朋得第一，有助銷路。據十朋的老師王之望（1103-1170，1138進士）說：

余為博士，太學有王生十朋者來學焉，余得其程文，在百千人中卓然也，因置之異等。其後學益邃，論議益純，而文日益奇，月校歲考，屢先多士。紹興十九年（1149）秋，遂試上舍為第一，諸儒厭〔壓〕服無異辭。<sup>85</sup>

在當時太學中不少人有投行卷之舉的背景之下，難說王十朋不會將其文字呈給相關人士，而且他在太學考試屢得第一，其考試文字通常會被刊刻流通。在這種情況下，考官大有可能熟悉其風格，舉行進士考試時，就因此拔擢王為第一。<sup>86</sup>當然，將自己平日的作品呈給尊敬的長輩或老師，這樣的作法無可厚非，也是種禮貌。從這個角度而言，投贄文字未必盡出於功利的算計。此外，這麼做至少沒有壞處，或許還有意想不到的用處。上述的事例在在透露，士人投贄文字，無非希望自己（或行文風格）被記住，在青雲路上能先過第一關。

把自己平日作品呈給有關人士之舉並不止於上述例子，樓鑰（1137-1212，1163進士）因胡銓（1102-1180，1128進士）之賞識而得進士。胡銓過世後，他追憶恩師的道德文章，提到：「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sup>87</sup>換言之，不少士人把自己的文字呈給胡銓，未必全著眼於科舉考試，但如前所說，這麼做並沒有壞處。此外，樓鑰本人在省試前，亦曾「投贄諸公」。<sup>88</sup>以樓鑰這麼優秀的人也不排除投贄文字，可見這樣的舉動在南宋並不是見不得人，或非法的行徑。

84 宋·陳益，〈序〉，收入宋·陳善，《捫詩新話》（臺北：新文豐，1985），頁1。

85 宋·王之望，《漢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5，〈故萬氏夫人墓誌銘〉，頁13b。

86 有關王十朋生平，略見鄭定國，《王十朋及其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頁9-118。

87 宋·樓鑰，《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76，〈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頁14b。

88 見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別集類一二》，卷159，頁1373。

除此之外，士人投贄至少有個實際的例子。王義山（1214-1287，1263進士）的文集裡有〈謁湖南倉趙端齋〉一文，長約七百字。文中稱讚趙端齋「惟庾司最係民命，惟振貧恤孤，而後可以言廣惠；惟貴糴賤糴，而後可以言常平；惟不奉青苗如富紹庭，而後可以居此官；惟舉行荒政如朱文公，而後可以稱此職。此固明公之素學，豈待書生之贅言？」此文最後說：「方其〔指自己〕刻苦於功名，間亦用工於詞學。雖文章末技，未足為吾道之尊。然科目累人，止得為程文之習……願借齒牙之餘論，庶成羽翼之深恩。伯氏吹埙，仲氏吹篴，敢謂同聲而迭，和大木為宗，細木為桷，尚期並蓄以兼取。」<sup>89</sup>王義山後以博學宏詞科中進士（詳見下節）。自內容看來，此篇是他尚為諸生時請謁之文。其中提到自己工於詞學，也為程文。因此應有其程文集隨著這篇，一起呈給「湖南倉」趙端齋（端齋應是字或號，但未能查得此人）。標題中的「倉」指的是「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簡稱「倉司」。就職掌而言，倉司署理「常平、義倉錢穀、莊產、戶絕田土、及貸青苗錢，與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和解試或漕試完全無關。<sup>90</sup>但王義山仍向彼投贄，為的正是希望在功名路上能得到貴人相助。此外，從前述引文中可看出，義山對趙端齋的稱譽實不無阿諛之處。然而義山不以此作為羞赧，保留此文；其後人或弟子亦不以為非是，收在其文集中。由此可見，這樣的投贄行為在當時並非罕見。

有個小問題或值得一提：投贄的文字內容是否皆為時文？上述樓鑰提到的例子告訴我們答案是：不一定。此外，據學者研究，江湖詞派出現於南宋中期（約1176年前後開始），此派中人有許多是科舉失利的士人。由於家計或享樂問題，不少人向士大夫投獻詩詞，干謁權貴，在當時頗造成問題。<sup>91</sup>而陳善與王十朋的投贄時間都在南宋中期之前。筆者懷疑南宋中期以後，江湖詩派的投贄、干謁的行徑，源自太學士子的投贄之風。

宋代投贄文字的作法在社會上應該留下了烙印，即使在金人統治之下也見痕跡。元好問（1190-1257）的學生王惲（1227-1304）回憶說：「余年廿許，以時文贄於先生。公喜甚，親為刪誨，且有文筆重於相權，泰山微塵之說。」<sup>92</sup>金朝亡於公元1234年，王惲廿幾歲時已生活在蒙古政權之下。其時科舉尚未恢

89 宋·王義山，《稼村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6，〈謁湖南倉趙端齋〉，頁17b-18b。

90 見龔延明，《宋代職官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488。

91 見郭鋒，《南宋江湖詞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25-31。

92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17，〈追挽元遺山先生〉，頁1a。

復，王惲有此舉，難說與北宋後期投贄之風無關。

## （二）有序文的個人刊本

投贄文字自然不可能全被刻成印本流傳，但是這種考試文化到了十三世紀似乎有了新發展。此處有必要略提科舉考試背後的文化與政治背景。前面談過，北宋後期與南宋初期的黨爭激烈，影響了科舉考試。程學在南方的傳播受政治的侷限。秦檜死後，情況有所改善，但直到孝宗時代（1163-1189），黨爭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屆至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爆發慶元黨禁，朱熹一派理學人士遭列「偽學黨籍」，被逐出朝廷，或貶官，或放逐，相關著作被禁。根據魏希德（Hilde de Weerd）的研究，黨爭與黨禁對科舉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出題方面避免出與時政有關的題目，以免引起爭端。隨著黨禁在十三世紀初逐漸解除，程朱理學在士人間的影響力日益提高；而且理學人士在朝廷中也漸獲重要職位，對科舉的發言權也增大。因此在出題方面，受朱熹的影響——因為他生前給學生出時事考題，策題曾出現與時政有關者。但是如此一來仍非沒有觸犯當道的顧慮。此種顧慮一直要到淳祐元年（1241），理宗（1225-1264在位）下令二程與朱熹入祀孔廟，策題才以論述時政為主。魏希德還提及，十三世紀以前，科舉考試中很少出現質疑經、史、子等典籍中的一段文字，指定考生論述，而這正是理學家要學生仔細思考的地方。但是到了十三世紀，這樣的考題於焉出現。這表示理學在科舉考試內容的影響力有所升高。儘管如此，在端平二年（1235），嘉熙二年（1238）和淳祐元年（1241）的省試中，得狀元的卷子並未特別與理學有關。但在淳祐四年（1244）的考試中，情形為之一變，省試第一名的答卷和理學相關；1250年代的三次省試狀元答卷，也都和理學相關。理學可謂從此佔據了科舉的舞台。<sup>93</sup>

簡述十二世紀前半葉到十三世紀中葉的演變後，我們比較能理解下面這個例子。太學生鄭玠（1244進士）於嘉熙四年（1240）將其所寫的策文集結成書，請李昉英（1201-1257，1226進士）寫序。李稱讚說，一般人寫時文，考科舉，只想及第，但是鄭玠卻在答策中直言不諱：

極言天下事，皆有關於君德，有裨於世道。方鯁論崛起，與國論爭鋒，禍且不避，寧得失計耶？胸中所存，定非尋常諸生拔尺寸比，是真不負皇朝淑養之意。衡文者拔其尤，則公論猶未泯，可為斯文賀。君其堅此志勿渝，厚其養勿餒，大建立於世，垂聲名無窮。毋

<sup>93</sup> 見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331-336, 345-373.

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吾黨所望也。<sup>94</sup>

序文中「毋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的「人」指的應當是讀這些文字的人。可見鄭玠有意出版這些文字，提高知名度。上世紀他的前輩如陳善，樓鑰（甚或王十朋）等所做的是投贄平日所作的時文。為什麼他要再向前一步，刊印個人時文？或許求利是原因之一，但想讓其他官員瞭解其人及其風格同樣是主因之一。刊印個人作品可以流傳得更廣，何況鄭是太學上舍生。<sup>95</sup>不過李昂英在序中說「毋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對鄭玠要刊印其作品並沒有任何驚訝之意，也反映當時刊印個人時文作品之舉並非罕見。這種作法是否延續北宋後期利州考生自印時文作品（見上一節），尚待進一步考究。然而個人時文作品有了知名官員的序文，效果可能不同。鄭請李寫序，必然知道李是寶慶二年（1226）殿試的探花。無論是就市場銷路，或是當成投贄文字，訴求力更強。其次，李昂英在序中的讚譽非常，使他更與眾不同。前面說過，策題要和時政關係密切，而毋須顧慮政治上的效應，須到淳祐元年（1241）理宗下詔將二程與朱熹入祀孔廟後才受保障。而序文中李昂英盛讚鄭玠「方鯁論崛起，與國論爭鋒，禍且不避，寧得失計耶？」這是很高的讚譽。換言之，在沒有保障之下，鄭玠居然放言高論，勇氣可嘉。結果鄭在淳祐四年考上進士。說不定這本時文冊子真的幫上忙了。

李昂英另外替許孟珩的殿試廷對策寫跋文。許在廷試中排名第七，李稱讚他說「士初試大廷，多未脫時文氣，讀許孟珩對藁體製全似奏疏」。又說：「然歷國初以來，三百年間名公鉅卿由第七人者絕少。若有所待，勳業與名節俱不朽，深有望焉。」<sup>96</sup>許孟珩的仕途是否更上一層樓，無法確知。但他刊印其作品的確意有所指，是可想而知：雖然他廷試得第七，但仍自認為對策寫得不錯。我們也可以想見，他至少可以把李昂英的跋文在親戚、朋友與同事間流傳。

文天祥（1236-1283，1256進士第一）的老師歐陽守道（1209-1273，1241

94 宋·李昂英，《文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題鄭上舍玠大學策藁〉，頁2a-b。有關鄭玠生平，略見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3652。

95 太學三舍法在南宋仍被採用。太學生先就讀於外舍，其學與行通過考評後，升入內舍。再通過考評後，升入上舍。如果在上舍表現優異，即授以進士頭銜。據研究，有些人的確是由此途徑獲取進士，其他人仍須參加省試。因此太學上舍生員的頭銜原本就有助於時文刊本的銷路。有關三舍法，略見王建秋，《宋代太學與太學生》，頁66-67。

96 李昂英，《文溪集》，卷4，〈跋許廣文一鶚廷對〉，頁2b-3a。

進士)也有一篇為策問而寫的序文:〈擬解試策序〉。策稿的編寫人是同縣(廬陵)的劉景豐,其中收錄劉景豐和同窗的策問。守道在序文中說明:「詔舉進士之歲,吾鄉諸齋擬策四出,其間有志當世者亦書策可行,孰謂非誼之流亞歟?」「擬策」是考試前,學生或教師擬策題回答,類似今日的模擬考試。守道所說的情形很不尋常,要考科舉那年,地方諸生都會寫策文予以刊行。他又說:「擬策者出於窮澗頹壁之下,兄弟師友不朝夕溫飽之間,相向輒言曰:『上心若何正?東宮若何教?民病若何甦?邊憂若何解?』一得其說,細書盈紙,出入經史典故、古今格言,而潤色之以文采。」因此如果當軸能得知答策所說,轉呈其意見給皇帝,就可能發揮作用。如果此路不通,擬策刊印流布,為其他考生閱讀,自己的意見成為那些及第者的看法,轉而讓考官得知,豈非善事?而他們受皇帝詔見時,能不以陳腐之論應對,也不負其食君祿。<sup>97</sup>因此,守道不但不以為刊刻那些作品是在尋求知名度,反而稱讚是有益世道之舉。他的看法是否太理想化,實難斷言,但那些士人出版時文冊子,投贄文字的心態不問可知。這些時文有了當地知名士大夫的背書,更可引起別人的注意。

歐陽守道另有〈省題詩序〉是寫給一位朋友「壽翁」的集子。從序文看來,也從「壽翁」的稱謂看來,這位老先生並未得進士。但守道稱讚其省題詩:「予歎此詩幼學之所從事。而書市所刊,或雜以輕薄子鄙褻語,口授之業不為刪擇,或反賞愛其流麗,而使效習之。如此而責以習尚莊謹,不可得已,是亦賊夫人之子。」<sup>98</sup>壽翁未有進士功名,仍不妨礙出版其考試作品。有了守道的推薦,更可以和書肆的類似刻本一爭高下。另一方面,刊刻自己的作品,也顯示其中的文字有可學習摹仿者。

文天祥是寶祐四年(1256)殿試狀元,知名度不言可喻。他為在太學考試名列第三的李彝甫的殿試策寫跋文。特別的是,求文者係李之弟子,非其本人。全文引出如下: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旦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

97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9,〈擬解試策序〉,頁12b-13b。

98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10,〈省題詩序〉,頁6b-7a。

是為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sup>99</sup>

這篇跋文寫得有褒有貶。李彝甫的門人刊行其殿試策，有意彰顯其師文章出眾，而刊印本也應該會在李的親友、門徒，甚或同僚間流傳。當然，其中不無利益的考量。但是文天祥卻反過來教訓那些「好事者」——這個辭就透露言下之意，李彝甫的這些文章不算太好；重要的是其中所懷，你們這些「好事者」根本看不出彝甫志在千里。

然而有的人出版時文稿另有用意。文天祥替前一小節所提的王義山之博學宏詞科擬稿寫跋即為一例。宋代科舉考試至北宋中後期，以經義、策、論為尚，王義山「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但文天祥安慰他說：「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為是也。」<sup>100</sup>而根據王義山自己的說法，他在景定二年（1262）廷對時，「覆考祕書文公天祥批第一等，上擬擢在首選，時給事侍郎徐公經孫（1192-1273，1226進士）為詳定同邑人也，他有所主，先得某所獻策，以極言時事抑之乙科」。<sup>101</sup>王義山因直言受抑，難怪有所不滿。其稿附上文天祥的跋文，表達當年受抑之屈。由此可見，儘管理學已佔據科舉出題的方向，在答策中批評時政並非沒有風險。不僅如此，義山替周必大的時文集寫跋文，文中對必大的程文頗有議論，批評說：「益公〔周必大〕程文殊有可議，如〈繡衣鹵簿記〉……記中所欠，謂之博學可乎？」又說：「此科得人不皆大人物也。」<sup>102</sup>但義山後以博學宏詞科中第，因此對此科頗有意見。

黃仲元（1271進士）為族人黃耕叟的時文作品寫序，譽其「賦瀏亮，論朗暢，策明整，而前軍尤萃。其良不試則已，試則願中，政未可以技小之。」

雖然，文謂之時，與其高下。時之春，麗澤百篇，一變也；時之夏，精騎，再變也；時之秋，濯錦，三變也；迨秋而冬，變之極，則為已效體矣。天運回旋，冬轉而春安，知不復變，而為麗澤百篇乎？變而麗澤百篇，猶有老成人端章甫氣象，變而為唐明水；披沙揀金，

99 宋·文天祥，《文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4，〈跋李龍庚殿策〉，頁6a-b。

100 文天祥，《文山集》，卷14，〈跋王元高詞科擬藁〉，頁6b-7a。

101 王義山，《稼村類稿》，卷29，〈稼村自墓誌銘〉，頁16a。

102 王義山，《稼村類稿》，卷10，〈周益公宏詞程文後跋〉，頁9b-10a。

則如囊沙背水，非老將不能。吾耕叟燈窗課兒，試拾一二篇何如？庶異時可藉此為行卷。<sup>103</sup>

作者在序裡對黃耕叟頗有讚譽之辭，難免出於族誼。然而文中頗有些曖昧難明之處，以下試作解釋，以探作者原意。「麗澤」一詞原出《易經·兌》：「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指朋友間相互切磋，此處或指從多讀文章中學得寫時文的技巧。「精騎」原指精銳的騎兵。北宋大詞人秦觀（1049-1100）自覺記憶力衰退，「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sup>104</sup>這書大概是方便文人寫作，易於檢索之用。朱熹（1130-1200，1148進士）也看過這類書。他在給好友呂祖謙（1137-1181，1163進士）的信上談到在福建建陽發現這類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關鍵。」<sup>105</sup>現今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典藏宋本《精騎》（存三卷），即為當日的科舉用書。<sup>106</sup>黃仲元用「精騎」一辭，可能指多讀文章後，找出精華的重點記誦。「濯錦」是指四川成都一帶出產的織錦，華美異常。此處可能是說文章要寫得華麗，如濯錦一般。「效體」的「效」有「顯示、呈現」之意。此處效體大約指時文作得成熟，可以去考進士。如果這種解讀誤差不大，則黃仲元認為寫時文須經歷春夏秋冬的幾個階段或進程。

此外，自「披沙揀金」和「囊沙背水」二辭看來，黃耕叟也在選輯時文稿。而作者說黃耕叟也教其子寫時文，請他自其中選一二篇，將來以為「行卷」。這很清楚地透露，編印自己的時文的確是有行卷的用途。換言之，到了南宋後期，自己的時文作品的用途，和他們唐代前輩的行卷一樣，投遞給可能影響他們前程的官員，或輾轉流入後者手中。此處明言「行卷」，看來再明白不過。

北宋朝廷以考試糊名的方式，試圖擋住投行卷引起的流弊。但士人卻因印刷術的普及，刊刻時文，轉個彎，突破重圍，以另一種方式引人注意。到了南宋，士人再利用印刷術的便利，請士大夫寫序，進一步提高自己中第的機會。這是一個新的發展。筆者曾指出，請士大夫為自己的時文刊本寫序，以增加知

103 宋·黃仲元，《四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題黃耕叟存藁〉，頁 25a-b。

104 宋·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點校本），《後集》，卷 6，〈精騎集序〉，頁 1546。

10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33，〈答呂伯恭〉，頁 1445。

106 見宋·佚名，《精騎》（宋婺州永康清渭陳宅刊本，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

名度或推銷其作品，在明代後葉大為盛行。<sup>107</sup>自前面的分析看來，明代的情形不過是重複宋代後葉的軌跡。

南宋末葉的史料中有份引人注意的文獻，收錄於方逢辰（1221-1291，1250進士）的文集，名為〈題賣試卷引〉共二篇，茲全錄於下：

足踏黃槐，好是一番大比。手攀丹桂，須要三軸雄文。敢奉楮先生，用供新貢士。少年紙貴，休誇賈誼才能；今日價高，正賴諸公斟酌。願揮兔管，早綴鴻名。

又

轉眼三年，又是一番造化；妝功一日，只消三軸文章。縱誇黃絹好辭，也用清江佳楮。當効驅馳之力，益加製造之功。庶可探春蠶食葉之聲，得無助秋鶚橫天之舉？請書姓字，即占鴈塔之題行，奪科名，盡中龍頭之選。<sup>108</sup>

方逢辰原名夢魁，得淳祐九年（1250）狀元，殿試時理宗改賜今名。然而其個性鯁直，後逢宰相鄭清之（1176-1251）、丁大全（卒於1263）、賈似道（1213-1275）擅權，力詆其非，而受排擠，有很長一段時間遠離官場，在鄉講學書院。<sup>109</sup>這篇序文可能寫於他投閒置散的時期。由於該書的內容無從得知，但猜想所收的時文應該有他的評語。書坊應該看中他出身狀元，因此時文冊子請他選文評點，當然掛上他的大名，又由他撰文推薦，必定有不錯的廣告效果——看來很像《儒林外史》中所描寫的若干情節。

上引兩段文字讀來趣味盎然，以下亦稍作解釋。「黃槐」指的是士子準備考試的季節，「大比」是指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丹桂」是指科第功名，「三軸文章」是指科舉考試須寫三場試文；「楮先生」指的是金錢；「春蠶」是春天畜養的蠶，比喻春天準備考試的士人；「鶚」是指有才能的人，此句是說幫助考生中進士；「鴈塔」是唐代新進士被題名之處，此處喻科第。從序文的內容分析，尤其是「敢奉楮先生，用供新貢士」，「今日價高，正賴諸公斟酌」和「縱誇黃絹好辭，也用清江佳楮」等幾句，都是推銷產品的用詞，而且書價可能不便宜。換句話說，方逢辰這兩篇文字成了該書的廣告文案。這實在是有趣

107 劉祥光，〈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頁 54-62。

108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題賣試卷引〉，頁 21b-22a。

109 宋·文及翁，〈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收入方逢辰，《蛟峰文集·外集》，卷 3，頁 5a-19a。



的發展。

書坊刊刻時文並非新舉，書坊請士大夫編時文已可見，請士大夫寫類似的廣告詞可能也已出現。不一樣的是，方逢辰居然願意寫這種廣告文字，而且編輯文集的後人或學生也居然不以為有傷斯文，而保留這兩篇。這不但說明像方逢辰這樣的士大夫也承認時文是準備考試不可或缺的材料，並且還認為由他們出面來做這事（選文），更有助於考生。相較於自北宋以來，時文冊的發行向受士大夫的批評，方逢辰替時文集寫廣告詞，是很大的轉變。

### （三）元代的時文稿

為個人時文集作序的例子在元代依然可見。但元初和宋代社會的情形有若干不同，其中德祐元年（1275）蒙古軍攻陷臨安，科舉停廢，成為最大的衝擊。儘管如此，時文稿的流通依然可見。馬廷鸞（1222-1289，1247進士）在至元廿五年（1288）為其同鄉方景雲的時文集作序。他在文中懺悔當年他有機會知貢舉，「初與典舉，冬烘，遂失景雲」。<sup>110</sup>換言之，他第一次主試時，錯失景雲的文章。這篇序用來彰己之過，並譽揚景雲。第二篇是胡次焱（1229-1306，1268進士）在大德五年（1301）為其友之父朱伯純的時文集寫跋文。<sup>111</sup>張伯淳（1242-1302，1271進士）為謝用和之父謝春塘的時文集所寫的序文，文末說：「〔他與〕延平謝用和錢塘邂逅，得觀迺翁春塘先生舉業一編……〔春塘〕天不假年，齎志泉下，遺芳餘馨在其子孫。」<sup>112</sup>其後謝用和又請元代著名的文學家與理學家虞集（1272-1348）為其父時文集題辭。<sup>113</sup>

元儒陳櫟（1252-1334）在延祐二年（1315）元廷恢復科舉後為前宋士大夫朱草庭（1274進士）的時文集寫序。陳櫟指出：「默軒朱君彙其先君子草庭先生程文若干篇，求諸名公序之，亦徵於予。予勉強應命，於今十有六年。已失

110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5，〈題方景雲課稿後〉，頁 4a-5a。

111 宋·胡次焱，《梅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跋朱伯純程文〉，頁 1a-2b。

112 元·張伯淳，《養蒙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題謝春塘舉業〉，頁 14b。

113 元·虞集，王頌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題春塘謝公程文〉，頁 91：「科第因時重，人材致力專，文園尋舊稿，魯壁護殘編。青紫空遺恨，蟲魚更別箋，運隨麟狩盡，宴託鹿鳴先。獨斷繇今聖，實興放昔傳，詎聞深美意，並世一陳前。」

之，再徵於予」。但二寫之稿又燬於火，因此第三度草此文。<sup>114</sup>可見朱草庭之子是在科舉恢復前即已倩人為其父之時文集作序。

吳澄為士人吳應予的時文寫了一篇跋文，說他的文章寫得極好，「不特程文然也，於文能儷語，又能散語……才瞻而學周若是，倘命足以符其才，豈有不遇者哉？」<sup>115</sup>從這幾句看來，此篇應屬科舉再行後之作。言下之意是，讀吳之文章者（如官員），如果有機會，請助其一臂之力，讓他有所用於世。

王沂（1315進士）有篇〈科舉程文序〉，提到「徐君勉之集本朝科舉程文，自延祐（1314-1320）迄至順（1330-1333）凡若干人，經義、古賦、詔誥、章、表、策凡若干卷」。<sup>116</sup>可見得這本時文集是因應科舉考試再行後，為市場的需求而編的作品。

元儒劉詵（1268-1350）「年十二三時，長於宋季程文若律賦、論策，臨文沛然蔚有老氣。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屬之。」<sup>117</sup>他的時文也曾被刊行，但在回覆晚輩的信中說：「所刊時文，非惟未嘗開口論其是非，亦志氣衰惰，世念日薄，乃未嘗一過目也。」從全文看來，其時文稿是在元代恢復科舉後方流通。此外，他在至正二年（1342）秋天為張性善（1281-1341）寫傳，文中提及張的著作中有「程文藁四卷」。<sup>118</sup>很不同的是，宋人幾乎不把自己的時文稿算進自己的著作中，但劉詵替張寫傳，卻列入其中。<sup>119</sup>這是一個新的現象，說明時文稿在元代有其不同於宋代功用。

楊維禎（1296-1370，1327進士）寫了篇〈聚桂文集序〉。他說：

我朝設科取士……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若師儒義試〔即模擬考試〕之所為取為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

114 元·陳櫟，《陳定宇先生文集》（清康熙35年陳嘉基刊本），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景印本，1985），卷3，〈跋朱草庭程文〉，頁295。

115 吳澄，《吳文正集》，卷63，〈跋吳君正文後〉，頁8a。

116 元·王沂，《伊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3，〈科舉程文序〉，頁12b。

117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10，〈元故隱士廬陵劉桂隱先生墓碑銘〉，頁19a-b。

118 元·劉詵，《桂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張處士性善〉，頁33a；卷3，〈答郭芳春〉，頁22b。

119 王義山說：「余未塵忝時，厭舉子業，每愛先儒。云：舉子業可取科第耳。既壯，習詞科，十二藁進卷，私擬百餘篇。後因閱呂東萊真西山文集不載所中程文，退而嘆曰：『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后山不為無見也。』」見王義山，《稼村類稿》，卷4，〈宋史類纂序〉，頁13a。

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嘉禾濮君樂閑為聚桂文會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取三十人……皆足以壽諸梓而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裁，而葛君藏之，鮑君仲孚又相討議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公之，士譽榮之，即今日之所選者……文會之作，固有補於司政不少也。斯文鉅梓，濮君又求一言以敘首。<sup>120</sup>

唐代以降，科舉及第又稱「折桂」，因此刊行《聚桂文集》的目的是為這些考試表現優異的士人宣揚，而且是由主考官執筆，推薦之意不言可喻。何以如此？姑無論元代科舉未恢復之前漢人、南人仕進極不易，即使考試再行之後，此二色人的出路也未見大幅拓寬。簡而言之，元朝鄉試自四色人（蒙古、色目、漢人與南人）共錄取名額三百人，但每一族群各七十五名。從人口比例以及對漢學的熟稔程度來說，俱不公平。至會試時，以三比一的原則，錄取一百名，而且在錄取名額上，也是各族群二十五名的情形。<sup>121</sup>換言之，元代的漢人與南人要擠入宦途，須面對空前激烈的競爭。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野有遺才的現象較宋代更為普遍。楊維禎以主考官的身份寫此序，明顯地希望三十名考生為官員所知，進而能為所用。下面會較詳細的解釋。

元代科舉停廢時期，時文刊本幾乎全失其功用，遑論銷路。前述歐陽玄的回憶已清楚顯示這點。但讀了上面在元代科舉尚未恢復前所寫的時文序或跋文，不免要問：那些時文集作者的後代為何要倩人為其先人的文字作序？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和蒙元時期戶計制度中的儒戶有關。根據蕭啟慶的研究，元代儒戶的設置原是為了救濟在北方漢地因戰禍而流離失所的儒生，讓他們與僧、道一般，享有優免賦役的待遇，另方面也算為國儲材。及至征宋後，此一制度亦行於江南（南方）。由於蒙元征宋之役不若在北方破壞之大，也由於征宋時已較知尊儒，因此南方登錄儒籍時，並未如北方須經考試沙汰。而入儒籍的標準是，凡前宋「登科、發解、真材、碩學、名卿、士大夫」皆得登入，標準相對寬大。儘管如此，在分揀儒戶時，仍有疏漏。最後決定以至元廿七年（1290）年江南戶口調查時，由儒戶自行提出的「手狀」（自述及證明文件）為憑，呈交尚書省查驗後入籍。此外，戶計制度規定每戶須有一人世襲職業，儒戶亦不例外。<sup>122</sup>

120 明·楊維禎，《東維子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景印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6，〈聚桂文集序〉，頁 3b-4a。

121 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 本 1 分（2010），頁 5-9。

122 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的一章〉，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

瞭解這層歷史背景後，就不難理解在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朝廷宣布恢復科舉前，那些時文集的用途是可能是用來強化手狀的內容，或是漏入儒籍而請求補入者的工具。但是這麼說仍不夠清楚，還有賴更進一步的研究解釋。

韓明士（Robert P. Hymes）對元代江西撫州家族聯姻的研究很值得參考。他提到森田憲司研究宋元時代修譜的情形，指出森田發現現存宋元二代的文集中，約有二百篇的族譜序，其中大多數來自元人文集。這種不對等的情形也出現於撫州的文集中。然而查考關於元代撫州族譜序的內容，發現那些族譜序中並未提及該族在元代是新聚之族，也未提到當時有聚族活動大增的現象。反而是從序中可見宋元之際，在鄉間的舊族因兵燹而大受摧殘。他們在元代試圖恢復，因此元代在撫州為數甚多的族譜序這個事實，並不反映當時新族譜的編纂活動。相反地，從那些族譜序或其他資料裡看來，許多家族在南宋即已存在——甚可追回北宋。同樣特別的是，那些族譜序大多出自「外人」之手。其中有廿八篇來自當時的名人如危素、虞集、劉壘與吳澄之筆，而吳澄一人就寫了十七篇之多。這顯示編寫族譜不是「圈內〔族〕人」之事，反成為一種公開的事業。

他指出，元代的改變是種「文化」上的變化：某些會被談論的社會事實在前代不曾出現，而且族譜序的撰寫從私人／親族間的作品轉變成公共的文類。就如同不少人會向社會上的名人索求墓誌銘、書序、贈別序與詩作一般，族譜序同樣有人索請。為什麼元人會請求那些名人讀他們的族譜，並且寫序？韓明士認為，請人讀本族的族譜，並請作序，是一種結交地方上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人，且與之建立關係的作法。這就與儒戶的制度有關，有了地方名人的族譜序，可以證明某個人的確來自儒戶。不寧惟是，韓明士還懷疑，這些名人是當時能引起地方當局／中央注意的少數管道之一。換言之，地方官都是外地人——元代尤其如此。如果他們想瞭解地方情況，或任用地方人士，最好的方式是詢問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像吳澄、虞集或危素這樣的人正是當地的名人。而如同把自己的作品呈給名人，是介紹自己一般，把族譜給他們，是向他們介紹自己的家族與親族。因此請名人寫族譜序一事，具有在地的政治社會功能。<sup>123</sup>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蒙元社會仍有時文流通的事實？蒙元征服南宋之初，科舉停廢，但時文依舊出現，而且由名人執筆作序或跋。筆者認為，這和元代的

---

究集》，第15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頁232-242。

123 Robert P. Hymes, "Marriage, Descent Groups, and the Localist Strategy in Sung and Yuan Fu-chou,"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17-128.

儒戶制度有關。那些時文（或其先人的時文）可以強化他們成為儒戶的條件。而由名人撰序文，使那些士人可以較有力地說服蒙元的官方接納他們成為儒戶，甚或任用他們。對於那些有名人撰寫族譜序的士人，如有時文稿可呈出，則將使他們的條件更佳。而對於沒有家族為後盾的士人，有了時文稿和名人的序，則將使他們的條件往上一層。前述馬廷鸞、胡次焱、張伯淳與陳櫟為人所寫的時文序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執筆。就這個意義而言，這也是一種投贄——元代模式的投贄。換言之，儘管個人時文集脫離了原先的時空，在元代初期，仍有其殘餘價值。

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朝廷宣布恢復科舉後，時文在前代的情形重現：刊行的時文再次出現書肆，其功能和前代如出一轍。上述吳澄、王沂、劉詵與楊維禎為士人的時文集寫序或跋，其目的和他們宋代前輩相同。不但如此，最近的研究顯示，科舉恢復後，各種坊刻考試工具書（包括時文集）大量地出現，並且是在元代才編纂刊行。學者甚至指出，有元一朝的歷史不到百年，但元代出版的書籍較之國祚更長的宋代毫不遜色。<sup>124</sup>從這個角度而言，宋代的發展顯示，只要有科舉考試，必然會引發時文的刊行。元代科舉停廢與恢復則再次清楚地展示考試與時文的關係。

## 六、閱讀時文的生活

### （一）日常生活中的時文

如前所述，時文到了南宋重要性大增，刊印量大，影響亦鉅。其中一點是考生的閱讀重心似有改變。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痛斥士子不讀書的現象：

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sup>125</sup>

朱熹所說的情形大約是南宋中期的狀況。他的學生兼女婿黃榦（1152-1221）在

124 略見沈俊平，〈元代坊刻考試用書的生產活動〉，《書目季刊》第44卷第2期（2010年9月），頁43-80。

12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卷69，〈學校貢舉私議〉，頁3360。引文中劃線處為筆者所加。有關朱熹對時文的看法，參見朱瑞熙，〈朱熹對時文：八股文雛形的批判〉，收入氏著，《礪城集》，頁23-32。

十三世紀給友人之子的信上說：「投老來歸，百事非舊，後生輩以為讀書者，充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專念一文一葉者為是，彼亦豈欺我哉。」<sup>126</sup>這句話直接點出年輕考生中，有很多人以為讀書是為了科舉，而準備科舉只須讀時文。許棐（1249卒）說得更露骨：「今士子自時文外，無學不仇」。<sup>127</sup>歐陽守道也描述當時士子重時文而不知學問的情形：

近歲士習趨下，號稱前輩者，或亦止於傳習場屋之文，謾不省講學為何事。幸而收科，自謂一第如探囊中物，不復增益其所未能，後學效之。凡書肆所售謂之時文，空囊市去如獲至寶，而聖賢格言大訓，先儒所為孳孳講切以覺人心者，反棄置之以為非舉子日力暇到。<sup>128</sup>

文中他批評一些前輩談學問只及時文，其他全不問。而他中進士後，有感於本身學問不足，「思與二三同志專意從事於所當學，然至者認科第為的，則亦惟索我於所亟用之時文」。<sup>129</sup>失望之情躍然紙上。劉辰翁（1232-1297，1262進士）的遭遇也頗類似。他中進士之後，頗有訪客請他講書。但他認為講書者的目的並非自我標榜，而是使學生有疑，主動來求解。問者可從反覆的詰問中自辰翁處解惑，而他也因此獲益，這才是講書的目的。但實際上，「問者嗇矣。何以待問者渴，而問者嗇也？有得少，而自謂已多者，以時文談經。經者，給時文上飲河者，驕若不可復進也。」因此頗表快悶。不僅如此，他還說：「科舉興，士能時文而止，而時文亦復猥鄙不達。」<sup>130</sup>這些都是說，當時考生只知道為了寫時文而讀經典，以為學問盡在此，也以為能作時文足矣，除此之外束書不觀。明代後期坊刻時文再度大盛，充斥書肆。明清之際的顧炎武（1613-1682）批評當時讀書人說：「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坊刻時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sup>131</sup>這樣的現象早在宋代已出現，

126 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景印元刻延祐二年本），卷 7，〈與鄭成叔書·與成叔之子元蕭書〉，頁 385。

127 宋·許棐，《梅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送旦上人序〉，頁 1a。

128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 16，〈青雲峰書院記〉，頁 14a-b。引文中劃線處為筆者所加。

129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 16，〈青雲峰書院記〉，頁 14b-15a。

130 宋·劉辰翁，《須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頁 19a-b；卷 6，〈曾季章家集序〉，頁 38b。

131 清·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卷 19，〈十八房〉，頁 472。另參閱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

並非明末的獨特現象。

上述對於時文的描述雖屬負面，卻也反映出考生因準備科舉，深受時文的影響。南宋士大夫的詩中也有若干顯示其重要性。陸游（1125-1209）的學生戴復古作詩自況以時文取第的辛酸：「爛茅遮屋竹為床，口誦時文鬢已霜；妻病無錢供藥物，自尋野草試單方。」<sup>132</sup>窮儒為了考科舉，妻病無錢醫之狀可謂淒慘。而林希逸（1235進士）在其詩中形容士子只讀時文，不讀儒書的勢利狀：「場屋時文百態新，《六經》門戶冷如冰；江湖有客奔馳倦，來問詩書向上層。」<sup>133</sup>王柏（1197-1274）則暗諷那些只讀時文不讀書的士人：「襟佩青青白面郎，未成佔畢已飛揚，深嫌實學規模拙，只把時文日夜忙。志氣崢嶸謀富貴，身心荒落敗綱常，他年窮達皆無據，卻笑儒冠誤可傷。」<sup>134</sup>陳藻（生卒年不詳）則說：「詩社已收風月美，舉場祇用粃糠殘，百錢聊買時文看，容易如君直換官。」<sup>135</sup>姚勉（1216-1262，1253進士第一）在考試落榜後自謂：「去歲春風客帝京，西湖煙雨透清明，蘇堤畫舫春三月，天竺清鐘夜五更。行李裹書歸舊隱，野花沽酒賞新晴。只緣未讀時文熟，端合山中且菜羹。」<sup>136</sup>此詩作於淳祐十一年（1251），兩年後，姚勉以進士第一得解。不知是否係讀熟時文之故。巧的是，前面提到把王義山從殿試榜首拉下來的徐經孫，也有首詩談到對已中進士的長孫的期許：「辛勤場屋一書生，六卷時文謾策名，身事兩朝奚所補，恩覃五世亦何榮。前人慶澤宜豐報，爾輩官曹詎可輕，移孝為忠斯不負，更須勤學紹家聲。」<sup>137</sup>徐經孫說只讀了六卷的時文就可考上進士，言下對這種情形頗為輕蔑。簡而言之，儘管不少士大夫私底下對時文並無好感，但也都無法否認其重要性。南宋文人在詩作中提到時文，足見時文深植於他們的生活之中。

的生產與流通》，頁 98-99。

- 132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訪友人家即事〉，頁 3b。
- 133 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王日起謀請樂軒主席其鄉隱山堂喜以詩贈之〉，頁 20b。
- 134 宋·王柏，《魯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贈吳城〉，頁 21b。
- 135 陳藻，《樂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謝余鴈鴉聽易惠詩一首〉，頁 13a-b。
- 136 宋·姚勉，《雪坡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5，〈次友人示詩集辛亥春〉，頁 4b-5a。
- 137 宋·徐經孫，《矩山存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長孫敏學授承務郎〉，頁 12b-13a。

元儒黃潛（1277-1357，1315進士）提到曾祖黃夢焱在淳祐十年（1250）得進士前，曾受知於觀文殿學士吳淵（1190-1257，1214進士）。吳淵勸夢焱去考漕試。但是曾祖很有志氣，以「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為辭而婉拒好意，要以一般的解試入途，不願參加有特權的漕試。<sup>138</sup>文中「槐花黃」指的是應考的季節，所以「舉子忙」。根據趙升（十三世紀人）的《朝野類要》中所說：「本朝之制，文臣自入仕著綠，滿二十年，換賜緋、銀魚袋。又滿二十年，換賜紫，金魚袋。」<sup>139</sup>所以「秀才綠」，是指考上進士。上引「舉子忙，槐花黃；時文熟，秀才綠」應是當時俚諺。這和前述南宋初年太學中流行的俚諺「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意思相近。換言之，幾乎所有人都認知做學問是一回事，考進士是另一回事——時文是科舉考試的必讀物。

這樣的認知即使是理學家也接受了。真德秀（1178-1235，1199進士）任潭州通判時，寫〈勸學文〉勉勵當地州學生員，學習先賢周敦頤（1017-1073）和胡安國（1074-1138）二先生之說。除此之外，他也指出，準備科舉之要是每月「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擷為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則仍以時文為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脉，次足以為當世之實用。」<sup>140</sup>真德秀此言意義重大。學者指出，宋代地方官學已成了科舉考試的訓練場所，而且時文也是學官教授的重心。此外，書院雖然是自由講學之地，也和理學的傳播有密切關聯，但舉業也不被排斥。因此時文是教學重點之一，亦可想而知。<sup>141</sup>但是士大夫私底下的抱怨或勸誡，

138 見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景印四部叢刊本），卷 23，〈記高祖墓表後〉，頁 18b-19a。根據朱瑞熙所說，漕試又稱漕舉，「景祐年間，命各路轉運司類試現任官員親戚。此後形成制度，由轉運司類聚本路現任官員所牒送隨侍子弟和五服內親戚，以及寓居本路士人、有官文武舉人、宗女夫等，舉行考試，試法同州、府解試。漕試合格，即赴省試。」見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頁 501。而這種考試的錄取率要比一般府、州試的通過率要高，因此屬於特權考試。

139 宋·趙升，《朝野類要》（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3，〈爵祿·賜借緋紫〉，頁 73。

140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景印四部叢刊本），卷 40，〈勸學文〉，頁 4a-b。

141 見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0.05），頁 64-65；梁庚堯，〈士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價值的展現〉，收入劉翠溶、石守謙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經濟史、都市



與在公開場合勸士子要讀時文是兩種不同的情況。真德秀在〈勸學文〉中提及時文，其含意有如今天縣市首長發文學校，要學生讀課外參考書一般。

## （二）儘早學時文

時文的受官方教育人士重視的程度似乎一步步提高。前面提過，衛博「自幼不喜時文」，表示他年幼就被迫進入時文的世界。但畢竟這是存在於私人求學階段的作法。不過情形在十三世紀改變了。寶慶三年（1229），信州州學重建落成，趙蕃（1143-1229）寫記文以資紀念。文中提到州學內也興復小學，教學內容為：「常請講書一員提其綱，逐月輪請經賦學輪各一員，分任教導：早經，次史，次古文，次時文。講習之程為甚嚴云。」<sup>142</sup>此處提到在小學的基礎階段就教時文，可見有些士大夫也認為時文越早教越好。不僅如此，某些士大夫也要自己的兒子早學時文。蒲壽宬（於咸淳〔1265-1274〕中知梅州，壽庚兄）有詩示其兒：「種穀一歲事，讀書一生期，方春不下種，竟歲常餒飢；少年不向學，終身成愚癡，飢猶一家愁，愚被眾人欺。彼蒼念吾父，爾輩得令師，欲速成揠苗，計日如耘耔，程文國有試，體製須及時。弱冠無所聞，出語人見嗤。爾勞我則恤，我憂爾奚知，中夜不遑寐，作此勸學詩。」<sup>143</sup>此外，即使是在金朝，時文仍然重要。元好問（1190-1257）在詩中自述生平：「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sup>144</sup>這些證據告訴我們，越來越多人承認寫時文雖屬末技，但越早學越容易科舉中第。讀時文的優先順序和熟讀儒典的優先順序雖未必並駕齊驅，亦不遠矣。這種轉變可能是北宋甚至南宋中期的士大夫未曾想到的結果。

除此之外，陽枋（1187-1267，四川銅梁人，1241進士）未中進士前，在四

---

文化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265-326，特別是頁274-275；梁庚堯，〈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中國史學會編，《第一回中國史學國際會議研究報告集：中國的歷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頁649-689。

- 142 宋·趙蕃，《章泉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重修廣信郡學記〉，頁7a。筆著懷疑本文非趙蕃所寫，因文中多處提到寶慶三年以後的工事，當時作者已謝世，故撰文者應為他人。儘管如此，無害於本文論述。
- 143 宋·蒲壽宬，《心泉學詩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示兒〉，頁7a-b。引文中的楷體書係筆者所改。
- 144 金·元好問，《遺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卷1，〈古意一首〉，頁10a。

川的文名已盛。早在紹定三年（1230）即有人想跟隨他學時文，他直接回應說：「賢輩欲獵科第，則師之時文可也。若欲求孔門顏子貧而樂、曾子詠而歸芻中氣象，則當熟看《語》、《孟》、《中庸》、《大學》，以求其至。」<sup>145</sup>陽枋的話說的很清楚，要科舉上有成，讀他的時文就夠了；如要做學問，則一定要讀透《四書》，兩者無法混為一談。他中第出仕後，文名更盛。到紹慶府任學官後，老是有人向他請教時文。他在一封回友人的信中說：「所見教時文亦善發明，某如今不甚喜說時文。此間諸友多以程文見教，却覺慵懶，遂杜門謝客，不復與士友接。」<sup>146</sup>大概來訪者實在太多，不勝其煩。但是他想完全與時文脫離關係，恐怕大不容易。宋末元初的方回（1227-1307, 1262進士）回憶說自己年輕時從叔父問學，但「時文之進，自州教授天台諸葛公泰始」。<sup>147</sup>這些例子在在說明時文有多重要。

宋遺民或元代的文人對南宋後期的回憶也提供一些印證。曾為南宋太學生的趙文（1239-1315）在十三世紀末替他的朋友寫〈至樂堂記〉，談到其友謂科舉罷後而讀書，係至樂之事，因為無「科舉之累」，「士之讀書，無時文掇拾之勞，無場屋得失之累……〔讀書教子時〕童子伊吾〔咿唔〕於前，聲若金石」。<sup>148</sup>換言之，如果國家仍實行科舉考試，趙文的友人大概不得不以時文督訓其子。而曾於咸淳六年（1270）得撫州解試第一的劉壘（1240-1318）回憶「予幼獨好公〔江萬里，1198-1274〕時文，每見一篇，熟玩不釋，夢寐猶記」。<sup>149</sup>吳澄回憶自己年輕時所看到的士習：「宋之季年，士自成童以上，能為進士程文，稍稍稱雄于時，輒輕揚偃蹇，謂莫己若者，十而八九，蓋不待擢科入官而後驕也。」又說：「蓋自宋末，舉世浸淫於利誘，士學大壞。童年至皓首，一惟罷〔疲〕軟爛熟之程文是誦是習，無復知為學之當本於經」。<sup>150</sup>吳澄看到了南宋末年，一般人教子習時文，多自童年始。趙孟頫（1254-1322）則說：「宋以科舉取士……

145 宋·陽枋，《字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2，〈紀年錄〉，頁 7b。

146 陽枋，《字溪集》，卷 6，〈答暖重三丈劄子〉，頁 18b-19a。

147 元·方回，《桐江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70 景印手抄本），卷 4，〈先君事狀〉，頁 533。

148 元·趙文，《青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至樂堂記〉，頁 19a。

149 劉壘，《水雲村稿》，卷 7，〈題古心文後〉，頁 7a。

150 吳澄，《吳文正集》，卷 27，〈送何長慶序〉，頁 13a；卷 28，〈送李教諭赴石城任序〉，頁 3a。

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sup>151</sup>總而言之，趙文、劉燾、吳澄和趙孟頫的說詞印證了南宋人認為應自幼便習時文的看法。

假使我們以時文為中心，回顧宋代印刷術與考試文化的發展，可以發現一個特別，甚至弔詭的情形。宋代印刷術的興盛促使知識的流通更普及。而從科舉的角度上而言，知識的普及讓更多的人有資格成為朝廷選才的對象。朝廷選才，在知識上注重的士人對經典的熟悉和活用。然而當考試本身成為主要目的後，時文便成了通過考試的手段。弔詭之處也就在此，原先文本（經典）才是閱讀的核心，時文不過是輔助性的側文本。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時文卻反客為主，成了士人不可或缺的讀物——側文本的重要性反倒有壓過文本的現象。換言之，透過那些批評考試制度或時文的聲音，我們看到從時文獲取知識的情形並不比透過經典學得知識的情形少。在許多準備考試的個案中，時文的重要性反而比經典的重要性更高。

## 七、結語

科舉考試和印刷術的關係在宋代社會可謂千絲萬縷，密不可分。拙文著眼於受印刷術影響而廣為流通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以期更清楚具體地瞭解宋代社會如何受印刷術與科舉考試的衝擊。

時文的刊行約自北宋初期即已見。到了中期，這個現象變得更明顯；被刊行的時文多是省試得第者。而到了至少十二世紀初，官方文書顯示，時文刊本已達氾濫的程度。官府或書坊不但刊刻省試中第之文，太學補試與公私試，以及各地解試的時文也在刊行之列。雖然朝廷下令禁止未經核可，此類刊本不得流通。而士大夫也勸告士子以讀經書為重，作時文只是末技。然而市場對於時文刊本的需求依舊強勁，並非道德勸說或法令所能扼止。這是時文刊本對於朝廷以讀經書為主的要求的悖反。也就是說，時文明顯地影響了考試文化。

從編輯的角度而言，宋代的時文可分四類。一類由官府刊行。一類是由書坊自行編輯、刊行。貫穿整個宋代，這兩類時文都可見流通。另一類則是由士人掛名編輯、評註，再由書坊刊刻流通。第四類由士大夫選文成冊。後兩類時文的流通在南宋才較顯著。過去認為，由士人掛名編輯的時文稿在明代中後期才出現。但本文的分析顯示，明代後期的情形看來是重複南宋中期的現象。換

<sup>151</sup> 元·趙孟頫，《松雪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第一山人文集序〉，頁 17a。

言之，中國考試文化的形塑，宋代——尤其南宋，是個關鍵期。

宋代科舉考試在太宗、真宗與仁宗朝採行不同階段的糊名方式，以避免唐代科舉中投行卷的弊端。近年的研究也主張，宋廷採用糊名法之後，明目張膽地投贄行為似乎被遏止。實際上，這種風氣仍然存在。唐代的投行卷的對象較固定，而宋代在糊名法實行之初，投贄的對象可能未必固定。但是拜印刷術之賜，他們可以採「亂石打鳥，必有一中」之法，廣為投贄。這樣的作法宋人不以為非，亦不以為有傷斯文。這是刊行時文後，對考試文化的另一衝擊。

到了十三世紀中期，投贄時文的形式有了變化。士人不只把個人的時文刊刻成冊，還請有名的士大夫為其作品寫序。請人寫序的目的不外乎求彼揄揚，增加所謂的知名度，或可附帶有助其銷路。過去認為，請士大夫為自己的時文寫序，是明代中後葉的現象。但此處研究卻發現，這種現象最遲在十三世紀中葉（南宋後葉）已出現，而即使在元代科舉名額極有限的條件下，仍然可見這種現象。宋元的情形顯示，明代中後葉的個人時文發展狀況，是重複南宋後葉的情形。

時文對於考生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一方面，士大夫批評學子只想寫好時文，冀求中第，對於真正的學問冷漠以對。南宋中期，理學家的批評尤多。但到了後期，他們依舊批評，但也承認時文對考試的重要。在這種認知下，南宋士大夫或文人的詩文中會提到時文在生活裡的角色，反映出這類文獻已深入考生的日常生活裡。不但如此，南宋後期，不少讀書人似乎認為要提早讓學生讀時文，時文的重要性又再高一層。閱讀時文的年齡因而提早。到了宋末，像方逢辰這樣的官員也參與了時文的刊刻，推銷刊本。誰能否定時文刻本的重要性？就此而論，時文改變士子的閱讀習慣與階段，這是時文對考試文化的另一深刻影響。

宋代時文的發展深深地改變了宋代以降的考試文化，時文刊本從此成為考生的必讀物，明末及有清一代的考生，少有不讀時文者。事實上，閱讀時文可說是成了一個辨別士人的判準：只有讀（過）時文的人，才符此稱謂。1905年清廷宣佈廢止科舉，改變錄用人才的方式，並擴大選才範圍，儒家經典不再是核心讀物，宋以降時文集立刻失去舞臺，走入歷史，很快地被後人忘記。

撫今追昔，宋代的經驗能給現今什麼啟示？我們可以大膽地指出，只要在考試成為公眾焦點的文明，一定會出現時文一類的考試工具書。今天，我們不可能看到清代以前的時文出現於書肆之中，但代之而來的，是準備各級考試的書籍。台灣如此，大陸如此，日本與南韓也不例外。就連不太重視大學入學考試的美國，也出現*Cliff's Notes*，幫助學生快速掌握名著的內容。可以想見的是，在我們有生之年，這類書籍還將繼續存在於我們的社會裡。

## 引用書目

### 一、一手史料

- 宋·文天祥，《文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之望，《漢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柏，《魯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義山，《稼村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宋·何大任，《太醫局諸科程文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何籙，《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佚名，《精騎》，宋婺州永康清渭陳宅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新文豐，1980景印光緒庚子〔1900〕年廣雅書局本。
- 宋·李昉英，《文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李復，《涵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標點本。
- 宋·沈括著，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林景熙，《霽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俞文豹，《吹劍錄》，臺北：世界書局，1980。

- 宋·姚勉，《雪坡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胡次焱，《梅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
- 宋·徐經孫，《矩山存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宋·袁采，《袁氏世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1985，冊30。
-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景印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 宋·張守，《昆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許棐，《梅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陳善，《捫詩新話》，臺北：新文豐，1985。
- 宋·陳舜俞，《都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陳藻，《樂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彭龜年，《止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陽枋，《字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黃仲元，《四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景印元刻延祐二年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景印本。
-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宋·葉夢得，《巖下放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 宋·葉適，《水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
- 宋·蒲壽晟，《心泉學詩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趙升，《朝野類要》，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宋·趙蕃，《章泉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劉安節，《劉左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劉辰翁，《須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樓鑰，《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歐陽修，《歐陽修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宋·衛博，《定庵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
-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
- 金·元好問，《遺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
- 元·方回，《桐江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70景印手抄本。
- 元·王沂，《伊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元·王恽，《秋澗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
- 元·吳澄，《吳文正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標點本。
- 元·張伯淳，《養蒙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

-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
- 元·陳櫟，《陳定宇先生文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1985景印清康熙35年陳嘉基刊本。
- 元·虞集，《虞集全集》，王頌點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 元·趙文，《青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元·趙孟頫，《松雪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
- 元·劉詵，《桂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明·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明·楊維禎，《東維子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景印四部叢刊本。
- 清·永瑆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景印本。
- 清·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收入《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景印民國9年刻本。
- 清·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二、二手文獻

- 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
- 王建秋，《宋代太學與太學生》，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
- 朱瑞熙，《嚳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何忠禮，《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 何忠禮，《科舉與宋代社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 呂宜軒，《呂祖謙的舉業教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李弘祺，〈中國科舉制度的歷史意義及解釋：從艾耳曼（Benjamin Elman）對明清考試制度的研究談起〉，《台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3，頁237-267。
- 沈俊平，〈元代坊刻考試用書的生產活動〉，發表於「第十一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縣淡水鎮：淡江大學，2010年5月21-22日。
- 昌彼德、王德毅、程元敏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5增訂版。
- 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
-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8。
-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 翁同文，〈印刷術對於書籍成本的影響〉，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5，頁487-495。
- 商衍鎰著，商志馥校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 梁庚堯，〈士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價值的展現〉，收入劉翠溶、石守謙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265-326。
- 梁庚堯，〈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中國史學會編，《第一回中國史學國際會議研究報告集：中國の歴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頁649-689。
- 梁庚堯，〈南宋教學行業興盛的背景〉，收入田餘慶編，《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559-570。
- 郭鋒，《南宋江湖詞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4。
-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重印。
-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 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收入氏著，《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冊8。

- 黃寬重，〈秦檜與文字獄〉，收入其《宋史叢論》，臺北：新文豐，1993，頁41-66。
-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2000.05），頁58-89。
- 劉祥光，〈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2期，1996，頁54-62。
-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的一章〉，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15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頁227-289。
- 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本1分2010，頁1-35。
- 羅時進、劉鶚，〈唐宋時文考論〉，《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4期，頁63-71。
- 竊慧如，《北宋進士科考試內容之演變》，臺北：知書房，1996。
- 龔延明，《宋代職官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日·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潘世聖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日·宮崎市定，《科舉：中國の試験地獄》，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
- 法·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實作理論綱要》，宋偉航譯。臺北：麥由出版，2009。
- 美·艾爾曼，〈中華帝國後期的科舉制度〉，收入氏著，《經學、科舉、文化史：艾耳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39-157。
- 美·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1995。
- 美·謝康倫（Conrad Schirokauer），〈論偽學之禁〉，何冠環譯。收入海格爾（John Winthrop Haeger）等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159-200。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ffee, John W. 2006.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1-77.
- Chaffee, John W. 1995.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New edi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hia, Lucille. 2002.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ow, Kai-wing. 2004.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Weerd, Hilde. 2007.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lman, Benjamin A. 1991.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 7-28.
- Elman, Benjamin A. 2000.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enfell, Michael. Ed. 2008. *Pierre Bourdieu: Key Concepts*. Durham, UK.: Acumen.
- Hymes, Robert P. 1986. "Marriage, Descent Groups, and the Localist Strategy in Sung and Yuan Fu-chou."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5-136.
- Miyazaki, Ichisada. 1981.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Trans. Conrad Schirokauer.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6; repri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irokauer, Conrad. 1975, "Neo-Confucianism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üeh." In John Winthrop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163-198.

# Examination Essays and the Culture of Examination in the Sung

Liu, Hsiang-kwang\*

## Abstract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spread of printing technology in the Sung, the quantity of book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mong numerous books in the market, one genre stands out—examination essays (*shiwên*). The significances of examination essays are multiple. First, the government published essays that were successful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mplying they are “model essays.” Second, commercial book printers, sometimes illegally, circulating them reveals the profitability of this genre. Third, that examinees purchased these “model essays” shows how eager they vied to pass the examinations. Fourth, by mid- and late Southern Sung, commercial printers asked literati or scholar-officials to compile examination essays, using their publicity to promote the sale. Fifth, personal exam essays in book form also appeared. They desired to increase their publicity so that they would be known by the examiners, and would be able to pass the exam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ompi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examination essays in the hope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books, as well as their significances in Sung society.

**Keywords:** Sung dynast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examination essays, commercial printers, printing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